

清季民初一個粵東地方讀書人的歷程

——以羅師揚（1866—1931）為個案

梁敏玲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提要

清季民初，有大量的讀書人長時間在地方活動。他們大多在清末考取或捐納了一定功名，卻不足以謀得較高的官職，通常只是充任地方上的塾師。這類人士到了民國也往往只在當地的政府機構中任職，好些長期從事教育，並活躍於種種地方事務之中，在當地影響深遠；而他們的一生，也見證了這個時代的變化。本文試圖通過考察羅師揚這位粵東地方讀書人一生的歷程，為理解清季民初的社會變局提供一個具體的個案，並以此探討地方上讀書人的眼光與行為如何受到其時社會與文化脈絡的影響。

關鍵詞：清季民初、地方讀書人、羅師揚、粵東、興寧縣

梁敏玲，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市海淀區頤和園路5號，郵政編號：100871，電郵：money-emf@163.com。

本文以筆者之本科畢業論文為基礎改寫而成，筆者謹此感謝程美寶老師的指導，感謝邱捷老師、吳滔老師及《歷史人類學學刊》兩位匿名評審人的寶貴意見。此外，還需感謝肖文評提供的資料，以及興寧退休老教師張伯濤在資料與地方掌故上的幫助；並對接受採訪的羅師揚孫羅桂元先生、王鏗所長，以及對本文寫作給予大力支持的興寧市檔案局、興寧市圖書館、興寧市政協文史委員會、興民中學與興寧市第一中學致以誠摯的謝意。

一、前言

1931年，本文的主角羅師揚辭世。當時，他的一位門生曾在挽言中這樣寫道：

先生雖在新世紀活過二十年，雖然也曾「足跡遍神州」，但他卻始終保存着古代中國式士大夫的情操。這是得着了數千年來傳統思想的精神，欲以鐵肩擔道統的士大夫。¹

這段挽言最堪玩味的兩個關鍵詞，一為「新世紀」，一為「古代中國式士大夫」，在這兩者之間，作者更用了「雖」和「卻」這一對連接詞，似乎是要加強兩者的對比。的確，只要我們稍覽羅師揚的生平，也會覺得這位作者所言非差。1866年生於廣東省興寧縣的羅師揚，出身舊學，多年經營科考，在清朝最後十年裡，他在地方上積極倡辦新式學堂，編撰各類新式教科書。民國肇始，他曾謀得廣東當局的一些職位，並長時間在家鄉興寧活動，參與大量地方事務，更於1924年出任興寧縣縣長，兩年後辭職，埋頭整理古籍，編纂族譜，最後於1931年去世。在一般的中國近代史敘述中，羅師揚可能名不見經傳，但如果說明他的兒子就是客家研究鼻祖羅香林（1906—1978）的話，人們就可能比較容易作出更多的聯想。起碼在地方文史的層面上，他多被今人貼上「客家名人」，或「客家名人」之父的標籤。²

不過，本文之所以以羅師揚為研究對象，並不是因為他是羅香林的父親，也不是因為他是「客家名人」，雖然這兩種身分對發掘相關的材料都有所幫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運用羅師揚的相關材料，盡量具體而微地重構他的生平，藉此思考上述的挽言所突出的對比。與千千萬萬背景相若的讀書人一樣，羅師揚一生的許多行事和抉擇，就是夾在他自己對「新世紀」的憧

1 陳子明，〈追悼羅幼珊先生〉，載羅則桓編，《羅幼珊先生挽言錄》（興寧：興寧書店，民國二十一年〔1932〕），頁55。

2 關於今人對羅師揚的評價，可以參考若干地方文獻。如《興寧縣志》的〈教育志〉曾為羅師揚立傳，參考興寧縣教育局教育志編輯室、興寧縣教育學會合編，《興寧縣教育志史料彙編》（興寧，1991）；此外還可以參考羅桂祥，〈緬懷祖父羅幼山〉，《興寧文史》，第3輯（1984年5月），頁83-90；東征期間，周恩來曾經給當時的興寧縣縣長羅師揚寫信，見〈周恩來一九二五年給興寧縣長的書信（影印件）〉，載《興寧文史》，第1輯（1981年12月），頁7-9。

憬和對「古代中國式士大夫」形象的認同之間而作出的。研究一個羅師揚，可能對於重畫中國近代史的「大事年表」沒有太大幫助，但對於理解一個地方上的個人甚或一個群體在歷史洪流中作過的嘗試和心態，也許能夠多添幾筆。

近半個世紀以來，「士」以及相關的「士紳」、「士大夫」、「士子」等概念長期貫穿着中國史研究的眾多領域，而出於研究者不同的側重點，使用「鄉紳」、「地方精英」、「地方文人」等概念的討論，也使得相關問題變得複雜難辨。³ 針對大半個世紀以來的「士紳」研究，已經有研究者作出綜述性的討論。⁴ 要言之，大部份研究者都認為，在帝國時期，士紳指具有功名的精英階層，他們是傳承中國文化的最重要角色。20世紀50、60年代的早期士紳研究以張仲禮等人為代表，突出了士紳在國家與鄉村社會間「上傳下達」的中間人角色。⁵ 而後，孔飛力等人則開始從士紳的政治控制轉而關注到地方士紳與國家此消彼長的關係，認為士紳也可能是王朝不穩定的因素。⁶ 國內不少研究者在涉及晚清民國的討論時，也多使用「士紳階層」這類概念，將其看作一個整體以觀察其在社會變遷中功能與角色身份的變化。⁷ 至

3 關於鄉紳、紳士與士紳概念的梳理，參考徐茂明，〈明清以來鄉紳、紳士與士紳諸概念辨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頁98-101。

4 關於士紳研究的綜述，參考謝俊貴，〈中國紳士研究述評〉，《史學月刊》，2002年，第7期，頁13-21；徐茂明，〈六十年來明清士紳研究述評〉，《社會史研究通訊》，第6期（2003年7月），頁32-52；程美寶在討論「廣東文化」的概念之前，對與「文化」相關的「文人」進行了討論，並作了一個簡要的學術史回顧，參考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4-18。

5 參考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53); Hsiao-tung Fei, *China's Gentry: Essays in Rural-Urban Relation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53);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Wiley, 1964).

6 參考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與孔飛力 (Philip Kuhn) 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等著作。

7 比如賀躍夫，《晚清士紳與近代社會變遷：兼與日本士族比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以及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天津人

1990年，Joseph W. Esherick和Mary Buckus Rankin編撰*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一書時，放棄「士紳」等僵化的類目，轉而使用local elite一詞，並將其定義為在地方社會的權力舞臺上具有支配地位的群體，把關懷從國家控制轉向各地精英在地方社會的活動。⁸ 蕭鳳霞與科大衛則提醒我們，英文「精英」一詞頗為含混，從晚清到民國，「精英」的權力基礎的認受性（legitimacy）亦不時受到挑戰。⁹ 鑑於概念的使用存在如此的複雜性，程美寶在討論中就把「士」或「士大夫」等概念的意義分作兩層，指出它既是一種社會的理想模型與當事人的主觀認同，同時亦指稱以此為楷模去塑造自身形象與行為的人。¹⁰

羅師揚的個案能夠說明的另一個層面是「地方」。關於「地方」，Joseph W. Esherick和Mary Buckus Rankin在討論中將其定義為縣級或以下的地域。¹¹ 他們認為，地方精英雖然會為自己謀取更高層次的職位，但其活動與意圖的焦點仍舊放在地方的場域（arena）之上（包括環境、活動場所與四週的社會空間，既可為地理意義上的，亦可為功能意義上的）。在中華帝國的廣闊疆域內，各地的精英根據不同的資源與社會環境對地方有不同的支配模式，同時身處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脈絡之中，與其他地方精英進行着互動。¹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日不少論著中使用的「local」或「地方」多為後出的概念，過份強調則容易有脫離當時語境的危險。在清朝文本中，「地方」往往加在地名後以泛指該處，又或者與中央相對，如清代官制中總督、巡撫就為中央派駐地方的官員，而所謂「地方官」則一般指省級或其下的官員，如藩臺、臬臺、知府、知縣等。太平天國後，中央權降，「地方」

民出版社，1997）。

8 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9 David Faure and Helen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11.

10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頁16-18。

11 他們也指出，在帝國晚期，由於精英的流動性，地方精英、各省精英與國家精英之間的界綫往往是模糊的，面對這樣的個案，地方精英的支配模式往往還具有地方以外的維度。參考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10, 314.

12 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10-11, 305.

督撫的力量則日漸抬升，成為晚清政治的特點之一。上述「地方」的含義與 Joseph W. Esherick 等人的所指並不同。本文使用「地方」一詞，則是為了說明這位舊學出身、功名不高的讀書人與家鄉的關係。興寧是羅師揚一生最主要與重要的活動範圍，他本人也參與到了大量當地的公共事務之中。於他而言，當提及「地方官」、「地方經費」時，基本着眼點也是他所說的「吾寧」一地。羅的這種角色與身份，與清季以前許多僅獲初級功名的讀書人相類，卻又因身歷變革，他的所做、所思、所想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¹³ 而在他之後，許多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人與家鄉的這種聯繫，則因時勢變遷不可避免地淡化了。羅的這種「地方性」，在清季民初的讀書人中可算廣泛存在。同時，在粵東客語地區，人們的活動又時時會超過一縣的範圍。筆者在文中姑且借用「地方」這個概念，希望能夠不囿於定義，貼近羅師揚的活動與思考，關心他與興寧、粵東乃至中國當時情況的互動。

筆者運用羅師揚有限的資料，嘗試作一微觀的考察，這受益於近年一些以個人歷史為研究對象的撰著的啟發。近年，不少研究者開始把眼光從整體分析轉向對個體的關注。王爾敏根據香港新界大埔海下村的翁士朝的藏書文牘，探討了「鄉里儒生」對傳播與普及儒學所起的作用。不過，王以儒生的處世之道以及其所承載的對民間的儒學教化為立足點，對翁仕朝所處的清季民初時期並未有更大的回應。¹⁴ 王爾敏把翁仕朝視作「邊鄙下層村里儒生」的代表，類似的研究視角，可見於近日一些學者對清末山西舉人劉大鵬的關注。¹⁵ 其中，羅志田和關曉紅都把目光放在科舉制廢除這一變革之上。通過分析劉大鵬日記，羅志田認為，正是科舉制的廢除導致了士人階層的沒落與四民社會的解體，進而對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實際上是用劉大鵬這一個體詮釋了「內地鄉紳」群體的處境。文中提及「口岸」與「內地」乃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並探討了科舉制廢除前後中國社會的巨大變

13 羅師揚，〈陳鴻初追悼會演說詞〉，載《山廬文抄》，卷1，頁24，收入羅師揚撰，羅香林編，《希山叢著》（興寧羅氏，民國二十五年〔1936〕線裝鉛印本）。

14 王爾敏，〈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近代文化生態及其變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頁31-60。該文較早前在臺灣發表，見王爾敏、吳倫霓霞，〈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第18期（1989年6月），頁75-94。

15 劉大鵬的日記成為研究者的重要材料，其《退想齋日記》已由喬志強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革。¹⁶ 關曉紅則結合官方與報刊材料，對比湖北的朱峙三的日記後提出，科舉制廢除後不少舊學出身者仍有大量機會分化整合，佔據社會權勢的重要位置，劉大鵬日記表現出來的失落情緒更大程度上是文化心理的失衡。¹⁷ 兩位研究者的立足點都是以劉大鵬作為「士」階層的代表，羅更為關注士人失望乃至絕望的心態，以及清季民國鄉村社會因廢除科舉而出現的劇烈變化，關則着眼於科舉停廢之際群體的現實出路。¹⁸ 他們的討論也給筆者帶來了一個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夠從研究對象自身的觀點出發，理解當事人眼中的世界？

同樣是對劉大鵬的研究，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劉50年的日記及其大量撰述為基礎，論述了劉大鵬的一生。她選取了「讀書人」（scholar）、「孝子」（the filial son）、「人民代表」（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商人」（the merchant）和「務農之人」（the farmer）這些劉在日記中自比的稱謂，用來形容劉大鵬的多重身份。正是在這些身份的延續或轉變中，沈艾娣通過展開對劉大鵬一生歷史的討論，使讀者看到近代社會與政治變遷如何對個體產生影響，並從中窺見山西地方社會變遷的脈絡。¹⁹ 沈艾娣的討論，對個體歷史投以關注，揚棄了「儒生型鄉紳」這類研究者使用的標籤，留心了劉大鵬主觀上的自我認同。沈的研究，也啟發了筆者如何

16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161-190。該文首刊於臺灣新竹《清華學報》，第25卷，第4期（1995年12月），頁137-160。

17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頁84-99。

18 羅志田在近期也有相關討論，參考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頁191-204。

19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7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沈艾娣通過劉大鵬日記以及相關大量材料，還進行了其他有關論述，如“Newspapers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19,” *Past and Present* 166 (2000): 181-204; “Village Identity in Rural North China: A Sense of Place in the Diary of Liu Dapeng,” in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eds.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New York: Palgrave,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002), 85-106; “Village Industries and the Making of Rural-urban Differ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xi,” in *The Chinese Workplace*, ed. Jacob Eyferth (Routledge, in press).

通過具體的個人歷史的個案，理解清季民初更為廣泛的政治與社會變遷。

就本文而言，羅師揚的個案還與「客家」有相當聯繫。羅師揚身處粵東客語地區，亦處於近代客家人意識日漸高漲的時期，也是羅香林的父親，帶着這點「先入為主」之見，筆者也希望能夠從中看出「客家」認同的一些蛛絲馬跡。今日，雖然不少客家實體論者仍舊沿着羅香林的思路，把「客家」視作先驗的群體²⁰，但如果我們把客家視作一個在歷史發展中各方因素作用下逐漸被建構的族群身份，那麼，「客家」觀念的出現，乃至客家研究的發端也自然是這一建構過程的組成部份。²¹「客家人」這一觀念是否體現在羅師揚這位著述頗豐的讀書人身上？羅香林開展的奠基性的客家研究是否在他父輩的筆下留下端倪？這些都是筆者面對羅師揚這一個案時無可避免想及的問題。

在材料方面，羅師揚一生著述頗豐，但相當部份已經散軼。現有羅香林編的八卷本《希山叢著》存世，其中收錄了羅師揚的詩文、時文、亞洲各國史教材、雜論、序言、壽序與誄詞以及少許書信。此外，羅師揚晚年曾在譜局中修譜，有25冊《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存世。在文章中，筆者以羅師揚的這些撰述作為主要材料，輔以地方文獻、報刊，結合官方相關制度變遷的材料，嘗試對羅師揚一生的歷程進行一個回應時代的討論。然而，材料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羅師揚並不像劉大鵬那樣有日記存世，其大量的藏書文牘也沒有如翁仕朝般得以保存。筆者對其一生的討論的主要綫索，無法不依靠羅香林為其父編撰的一份詳細的年譜。而我們知道，羅香林在客家研究等方面的學術見解，以及其時與國民黨聯繫密切而產生的政治取向，都不可避免

20 當代客家研究大部份的著作都來自客家實體論者，學者的關注點除了落在「客家民系」形成時間與地域，「客家」名稱由來，「客家人」主體，「客家」遷徙動因、過程、路綫，「客家」與當地少數民族關係這些爭論點外，還對一些涵蓋在「客家文化」範疇內的符號表現了相當的興趣。也有人着力於繼續羅香林的工作，如倡導把「客家學」建立為一門學科的王東，參考王東，《客家學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1 相關討論，可以參考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劉鎮發，《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2001）；還可參考陳春聲，〈清末民初潮嘉民眾關於「客家」的觀念——以《嶺東日報》的研究為中心〉，載周雪香、陳支平主編，《華南客家族群追尋與文化印象》（合肥：黃山書社，2005），頁49-64；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

會對年譜的選材與敘述產生影響。面對這一缺陷，筆者只能一方面時時注意年譜撰寫的取向，另一方面亦以羅師揚自己的撰述為重，嘗試對不同材料進行互勘對比。本文按時間順序展開討論，以羅師揚一生的歷程為緯，從中亦展現了科舉末造讀書人的心態、西學與新知的流播、近代的學制變革、新式學堂的開辦與新教科書的編撰。民國成立後，某些帝國時代的觀念如何被堅持或重新詮釋，乃至廣東政壇的動蕩與地方複雜的權力糾葛等等，亦在本文討論之列。通過羅師揚此一個案，本文希冀能夠回應近代史研究的若干共同問題。筆者深知自己學力有限，只期本文能夠為近代的地方讀書人，乃至清季民初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提供一些可供思考的角度。

二、羅師揚生平

同治五年丙寅（1866）二月，羅師揚出生於興寧縣東門外俠坡村羅家老屋。²² 興寧地處廣東省東北部，北部與江西省尋鄔縣毗鄰。自清雍正十一年（1733）至清末，興寧隸屬粵東之嘉應州。興寧扼東江、韓江上游，所處為粵東北的山丘地區，全縣以山地丘陵為主，邑民多務農。羅師揚的出生地俠坡村位於縣城東門外不遠處，村民多姓羅，「東門羅家」便是興寧羅族的一支，日後羅師揚為家族修譜，亦簡謂之「寧東羅譜」。就在羅師揚出生前不久，太平天國運動大大動搖了清廷的統治，地方多動亂，團練大興。咸豐四年（1854）的紅兵之亂以及咸豐九年（1859）石達開餘部入粵，興寧均大受影響，山賊亦由是四出。在局勢動蕩，王朝力量頗顯疲弱的時期，興寧一地的秩序主要由士紳控制的公局以及各鄉團兵維持。²³ 在這期間，羅師揚的父親榮輝公亦「思有所建樹」，助地方官鎮壓動亂。寧東羅家的不少宗人，也因提倡團練而發蹟，授獎官銜。²⁴ 不過，到羅師揚出生之時，羅家田地不

22 羅香林，《先考幼山府君年譜》，頁3，收入羅師揚撰，羅香林編，《希山叢著》之附錄。下文注釋，均簡稱之為《年譜》。

23 黃其藻編輯，羅師揚校訂，《興寧鄉土歷史》（興寧：興寧大昌公司，民國十三年〔1924〕）。其複印本由張波濤老師提供，特此表示感謝。

24 羅師揚對其父的憶述可參見羅師揚，〈先府君行述〉、〈先府君軼事〉，載《山廬文抄》，卷4，頁26-29、29-30，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寧東羅族之人在動亂時候的事蹟參見羅師揚等，〈家傳譜〉，《興寧東門羅氏族譜》（民國十六年〔1927〕），頁24。關於咸豐年間興寧的動亂，方志和鄉土志也多有提及，見咸豐《興寧縣志》、光緒《興寧鄉土志》以及民國《興寧鄉土歷史》。

多，其父榮輝公仍做着普通的小本生意，其母則為生計忙碌耕作。²⁵

三、青年時代的教育

七歲（1872年）的時候，羅師揚開始了他的讀書生涯，入讀縣城的陳鑾學塾，九歲肄業，肄業時獲授《春秋左氏傳》及《禮記》。第二年，羅師揚開始在城外龍田鄉就讀，歷時五年（1875—1880）。在這五年間，他所誦學的，不外《詩經》、《唐詩三百首》、《尚書》與《周易》這些明清兩朝初學士子須讀之書。²⁶光緒六年（1880）冬，年僅十五歲的他就用其掌握的文字與文類，對其身處的家鄉投以關注，成〈興寧縣記〉一文。該文短短百來字，提到了興寧的建置與沿革、面積、人口、山川河流，儼如官修方志的縮影。也恰如官修方志一樣，該文不僅僅是「記」，更兼及「論」，羅對興寧一地的風俗就作出了以下的批評：

士民競尚奢華浮偽，崇信仙佛巫覡青烏家之說，又性習奸刁，小有不平，即鼠牙角雀爭訟不休，則近來官斯土者，不得其人，不能興復斯文，轉移風俗之過也。²⁷

對比咸豐《興寧縣志》中〈風俗志〉之〈習尚〉，也提到「俗信堪輿，……甚有停襯（原文為「襯」，應為「襯」字形訛）在家，數十年不葬者。病鮮服藥，信巫覡，鳴鑼吹角……然好訟，凡有事，兩自謂直，不肯下。族鄉間判以理，未遽服；寧飭訴於宮，冀批牒直之……尚望官斯土者力懲澆風」。²⁸雖然官修方志的流通範圍有限，但此種觀點和用語卻很可能是羅師揚十分熟悉的。這類對本邑山川形變、風土人情的關注的敘述，不僅存在於官修方志之中，也見於好些私人的著作中。其時興寧著名的文人，比羅師揚年長22歲的胡曦（1844—1907），就在差不多的時候，先後編撰了《興

25 羅香林，《年譜》，頁3。

26 羅師揚所讀之書，參考羅則桓編，《羅幼珊先生挽言錄》，頁7；「四書五經」在明清兩朝特別受重視，被視為知書之士起碼必須記誦熟習的。關於舊學入蒙士子所從師學習之書，參考王爾敏的討論，見〈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近代文化生態及其變遷》，頁34-35。

27 羅師揚，〈興寧縣記〉，收入《年譜》，頁7。

28 咸豐《興寧縣志》，卷10，〈風俗志〉，〈習尚〉。

寧竹枝雜咏》、《興寧圖志考》、《梅水匯靈集》、《興寧山志》等幾部與興寧相關的作品。²⁹ 也許在這種對鄉邦的關懷下，羅師揚的討論正嘗試模仿時人的見解。至宣統二年（1910），他還成〈寧昌風物記〉一文，詳細記錄興寧的風物習尚。³⁰ 在該文對風俗的描述中，「崇信仙佛巫覡青烏家之說」之類批評已不見踪影，「吾寧」、「邑人」一類詞彙則被頻頻使用，從中可以看出，其時羅師揚對興寧的認同與感情已較年少之時大有增加了。

十七歲（1882）時，羅師揚受父之命，開始兼習時文，正式踏上經營科考之路。次年，羅師揚求學於龍田探花書院。³¹ 同年赴梅州應院試，不售。二十歲（1885）時，羅師揚考訂十七歲前所作，成《幼年文稿》，並自跋曰「三四年來，溺於八股，不復能彈此調也，八股之束人心如此也」。³² 對八股的不滿似乎是當時的普遍現象。羅志田在討論劉大鵬時曾提到，清季廢科舉前的一段時間，「不可徒攻時文」在劉大鵬眼裡已成「老生常談」，「日記中頻繁出現他慨嘆士人只知讀時文的記載」³³，而羅師揚爲了經營科考同樣只能「溺於八股」。一年後，羅師揚雖然再次在院試中失意，但對科考之路仍有期盼。³⁴ 而就在羅師揚院試失意的前一年（1885），比他年長十歲的鄉

29 胡曦（1844—1907），字曉岑，號壺國。癸酉（1873）科拔貢，翌年入京朝考報罷，後又屢薦不受，自是不復應考，歸而著書，對鄉邑文獻尤爲留意，個人著述與編輯整理的書稿有《興寧竹枝雜咏》、《興寧圖志考》、《興寧縣山志》、《湛此心齋集》、《湛此心齋詩話》、《梅水匯靈集》、《甘雨事類》、《扮榆碎事》、《鄉哲良規》、《宋鄉賢羅學士遺事考略》等。胡曦的相關情況見《興寧文史》，第17輯「胡曦曉岑專輯」（興寧：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1993）。

30 興寧有「齊昌」一別稱，「寧昌」又是「齊昌」的舊稱。唐武德五年（622），曾析古興寧境內的左別溪地流域置齊昌縣，縣治洪塘坪。唐貞觀元年（627）廢齊昌爲寧昌，歸還興寧。而後建置又率經變動。

31 清代的書院已經成爲專門講授八股文、培養科舉士子之所。探花書院是清末興寧縣三大書院之一，明嘉靖年間設於探花祠內。見咸豐《興寧縣志》，卷7，〈學校志〉。

32 羅則桓編，《羅幼珊先生挽言錄》，頁7。《幼年文稿》後大多被侵蝕不可辨認，尚能識別的有〈興寧縣記〉、〈板廬賦序〉、〈武仙岩記〉與〈洋傘子傳〉幾篇，相關情況介紹參考羅香林，〈洋傘子傳〉附註，載羅師揚著，《山廬文抄》，卷3，頁32，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33 參考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頁170。羅也提到，「讀書者多讀時文而不問經史子集或者可說是近代中國普遍的土風不佳」。

34 羅師揚，〈院試不售〉，載《山廬詩抄》，頁15，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人羅獻修考取了經古第一拔貢，科舉帶來的功名讓他在興寧聲名漸起。兩年後他設帳龍田，吸引了大批讀書人前往就讀，羅師揚就是其中之一。³⁵

二十五歲（1890年）時，羅師揚終於在第三次院試（庚寅科）中被錄為生員，取入縣學。³⁶不久之後，他在城內設館教學。與此同時，其師羅獻修已赴廣雅書院學習並被推為齋長，羅師揚則每月復為課藝，寄廣雅書院呈羅獻修批改。³⁷廣雅書院1889年於廣州成立，由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建立，「講求經史、身心、希賢、用世之學」，分經學、史學、性理、經濟四科。³⁸通過與書院中的羅獻修進行交流，羅師揚亦「漸習經說及性理之學」。³⁹

層層科考不一定能為千千萬萬的士子帶來功名，卻多少有助於開闊他們的眼界。光緒十七年秋（1891）的鄉試，讓羅師揚首次踏足省城。羅師揚坐船自東經石龍沿江而下，在船上輾轉幾天才來到廣州。⁴⁰沿途的東江流域地區，也是幾百年來粵東之人往廣府地區遷徙的路綫。⁴¹船到廣州，羅師揚帶着輕快的心情，寫下這首〈舟到羊城〉：

船頭小立雨新晴，畫舫笙歌四面迎。蛋女如花齊蕩槳，扁舟已到五羊城。⁴²

羅師揚眼中的省城廣州，很是熱鬧，水鄉之味頗濃，可以看出，羅師揚

35 參考羅則桓撰羅師揚母親誄文，轉自《年譜》，頁10。

36 羅師揚，《興寧東門羅氏族譜》，〈選舉譜〉，〈廩增附中〉。

37 羅香林，《年譜》，頁11。

38 參考張之洞，〈札委知府方功惠等監修廣雅書院〉、〈創建廣雅書院折〉，載高時良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頁771。

39 羅師揚，〈補月先生學行書〉，載《山廬文抄》，卷3，頁2，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40 羅師揚在〈舟至石龍遇風〉一詩中提到「霖雨連三日，江行至石龍」，載《山廬詩抄》，頁15，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41 關於明清「客家人」在嶺南的遷徙流動，參考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39-68的相關討論。

42 該詩及上引中的〈舟至石龍遇風〉均無提及具體的成詩年份，但考慮到羅師揚一生從興寧至廣州的次數並不多，後來幾次均在1910年後，其時羅的身份已大有提高，交通也更為便利，估計不會再乘搭這種需要輾轉多天的小船了；加上文風的考慮，筆者在此大膽猜測其成文時間應在羅此次首赴廣州之旅期間。

對這次廣州之行是有着相當期盼的。可惜的是，由於在鄉試中失意，羅師揚很快便離開省城歸邑教學，同時繼續經營科考之路。依清制，生員進學之後，仍需要參加各種考試。由學政主持，三年一次的歲考以及每次鄉試前進行的科試便是生員必須參加的，羅師揚自然也不例外。⁴³ 經歷了多次考試，他對科場風氣亦有所察所感。在翌年（1892）的壬辰院試中，羅師揚對科場有賣「進場金粉者」頗感意外，當同人勸他穿新衣進場考試時，他更是以年近三十，「難動薄情郎」的女子托意。⁴⁴ 科舉可算青年羅師揚生命的主題之一，而他對科考一些浮糜做法的不滿與屢試不第的失落，便讓我們看到當時世風的一些變化以及在制度之內「隨波逐流」的無奈。

其實，羅師揚走的是大部份讀書人的求學之路——先習四書五經於私塾，後習帖括之學以應付科考。此時雖值科舉末造，但由於學業仍是進入宦途的最主要渠道，讀書人大多仍以科考為務。與此同時，從有着鄉土聯繫的老家興寧到省城廣州，相信羅師揚這位讀書人的眼界也在擴大。雖然具體的影響已經無從考證，但身處近代的社會變遷，羅師揚筆下使用的語言確實在漸漸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又離不開各方信息的傳播與衝擊，下節主要着墨的就是這個現象。

四、「西學」、新知及用語的變化

近代廣東開風氣之先，在未有「西學」這個概念出現之前，不少西方實用的知識就已從這裡被點滴地帶進中國。不過，即使在廣東內部，沿海與山區的讀書人對所謂「西學」的接觸，也會有時間上先後的差別。對羅師揚這位地處興寧的讀書人來說，對西方開始關注，似乎是始自甲午一役（1894）戰敗之後。甲午之後，羅師揚的教學從經史轉向「經國利民之學」，並「鼓勵學子訪購新出西學譯本攻讀」。⁴⁵ 關於1895年在思想史上的標尺意義，學

43 有關歲、科考的規定，參考光緒《清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32，〈禮部〉，〈儀制清吏司六〉，頁268。

44 羅師揚，〈壬辰院試同人勸予衣新以詩答之〉，載《山廬詩抄》，頁14；〈壬辰院試有賣進場金粉者戲題一絕〉，載《山廬詩抄》，頁18，均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45 羅香林，《年譜》，頁14。苦於此處並沒有羅師揚本人的論述，「西學」一說只依靠羅香林的年譜，姑且採而用之，此處作一存疑的處理。而關於甲午的重要性，羅師揚在民國時寫的許多文章中，也經常以「甲午之役」作為回憶歷史時的一個標識。

界已多有討論。⁴⁶ 羅師揚的變化則告訴我們，甲午一戰的影響力也及至這位地方讀書人身上。不過，這種變化仍需更為細緻的討論。19世紀中葉以來，兩次鴉片戰爭的戰敗與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確實讓國人更多關注西方世界，但在科舉制這一入仕之途廢除以前，所謂「西學」對讀書人來說，不過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⁴⁷ 更何況，「西方」本身就是存在於「中」人觀念世界中、以中西之分為前提的籠統概念，與之相關的「西學」相應的也只有抽象意義。⁴⁸ 一旦將「西學」從觀念層面落到實處，不同的人因知識背景各異自然會有不同的理解。

我們也許可以先從羅師揚的藏書入手，探討他「西學」知識的來源。書籍作為「西學」的重要載體，在羅師揚眼中包括了什麼？以他當時有限的條件，又能搜集到什麼書籍？根據羅香林所編年譜，在羅師揚的藏書中，有《數理精蘊》一書。⁴⁹ 這套一百多年前由康熙主持編譯的53卷大型算學著作，甲午後被羅看作重要的西學著作之一。此外，羅師揚弟子也受師命「訪購」回兩本書，一本是1873年由上海江南製造局出版的三卷本《冶金錄》，另一本是1885年由益智書會出版的兩卷本《形學備旨》。《冶金錄》是洋務運動期間頗為流行的一種化學教科書，《形學備旨》則是一本幾何學教科書⁵⁰，分別來自當時三大西書出版機構中的兩種——清廷洋務派的官辦譯書機

46 參考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開放時代》，總第145期（2001年1月），頁48-56。

47 桑兵指出，直到19世紀80年代，才有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對西學感興趣。參考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臺北：稻禾出版社，1991），頁25-40。

48 桑兵也指出，在「西方」人看來，「西方」只是存在於東亞人的觀念世界之中，仔細考慮，西方內部實際包括許多民族和國家，甚至包括有效學習西方的日本，這是一個存在於觀念世界的籠統概念。具體的討論參考桑兵，〈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頁90-98。

49 羅香林在年譜中言，「府君原已藏有《數理精蘊》等書」，見《年譜》，頁14。根據《四庫總目提要》卷170，子部17，此為「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定律曆淵源》之第二部也」。此書在梅文鼎數學著作、白晉和張誠等進講的講稿等基礎上編成，包括上編「立綱明體」五卷，下編「分條致用」40卷，數學用表四種八卷。

50 見吳洪成、李兵，〈洋務運動時期西學科學與科技知識的引入及相關教科書的編譯〉，《亞太科學教育論壇》，第4期，第2冊（2003年12月）（http://www.ied.edu.hk/apfslt/v4_issue2/libing/libing2.htm#two）。關於西學教科書的譯介，詳細的討論可以參考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教科書新貌」一節。

構與教會主持的西書出版機構。⁵¹ 洋務運動時期，江南製造局是中國最大的西書翻譯出版機構⁵²，譯書「專以兵爲主，其間及算學、電學、化學、水學諸門者，則皆得資以製造，資以強兵之用」。⁵³ 其譯籍除了供製造局工藝學堂選用外，其他新式學堂亦會選用。而成立於1877年的益智書會又稱「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成立之初專爲適應當前教會學校需要而編輯一套初等學校教材。在教會人士眼中，教會學校的成敗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擁有好的和適用的教科書」。⁵⁴

無論這些書來自什麼時期或什麼譯書機構，由於羅師揚曾言「西學」有「尙實際，重方法，喜格物，能窮理」⁵⁵的優點，我們起碼可以看到，這個時候他所認爲的「西學」書籍很可能僅是他能接觸到的任何介紹西方格致之學的書籍，既包括有清前期康熙主持編譯之書，也包括能夠在市面上訪購得來的譯本。《數理精蘊》是清廷武英殿刻本，曾「以康熙御制的名義頒行全國，因而流傳很廣」⁵⁶，後收入《四庫全書》，洋務時期多個書局會將其重刊⁵⁷；《冶金錄》與《形學備旨》二書，則是洋務時期流行的化學和幾何學教

51 三大西書出版機構包括官辦、教會主持與民間商辦。其中，洋務派的譯書機構主要有京師同文館譯書處與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傳教士的譯書機構則有益智書會、廣學會、美華書館等。關於晚清時期的西書譯介與西學傳播，詳細的信息參考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教科書新貌」一節；着重從西書譯介與西學門類的設立討論近代學術分科的建立，參考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52 據梁啓超《西學書目表》統計，在1896年前出版的352種西書中，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刊的有120種之多，佔34.1%。參考梁啓超，〈西學書目表序〉，《時務報》，第8冊（光緒二十二年〔1896〕）。

53 梁啓超，〈變法通議·論譯書〉，《時務報》，第27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

54 這句話由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狄考文在在華基督教傳教士第一次大會上提出，參考費正清等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621。

55 此據羅香林所言，參考《年譜》，頁14。

56 戴逸，《簡明清史》（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08。

57 金陵書局、廣雅書局、製造局都曾對《數理精蘊》進行重刊，參考裘沖曼，〈中國算學書目彙編〉，《清華大學學報》（1926年1月），頁43-92。此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部藏有《數理精蘊》廣東藩司的重刻版。關於清初西學的輸入與清廷編撰的書籍，參考張蔭麟，〈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清華大學學報》（1924年1月），頁38-69。

科書。這幾本羅師揚能接觸到的書籍，也被梁啓超收入在1896年編的《西學書目表》之中，屬於包括「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氣學、天學、地學、全體學、植物學、醫學與圖學」在內的「西學」類書籍，該類書籍亦佔據了「已譯諸書」中的絕大部份。⁵⁸ 不過，雖然手中握有這些書籍，羅師揚能夠在何種程度上理解這些比較專門的教科書，卻是很值得懷疑的。「西學」於羅師揚而言，也許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迫於時局產生的需要感，是可以根據知識到手情況增補甚至改變內容和範圍的大雜燴。

同時，羅師揚鼓勵學生訪購的雖是「新出西學譯本」，到手的「西學」書籍卻無一是甲午後翻譯出版的新書，這自然與興寧地處山區，信息流通與省城相比頗有滯後不無關係。不過，和當時不少久居鄉里的讀書人一樣，羅師揚要獲得新知，除了閱讀書籍，亦往往會從外出之人的口中打聽。⁵⁹ 19世紀下半葉，由於廣州長期以來獨口通商的貿易地位已被削弱，加之地方動亂頻仍，不少廣東商人轉而投資上海、香港與東南亞等處，各階層的廣東人也紛紛出洋從事各種職業。興寧雖然並非處在沿海地區，但水路頗通，亦不乏到南洋經商之人。⁶⁰ 羅師揚便自南洋經商的宗人羅燕賓口中獲知了不少海外時事，當中包括孫中山建立興中會等事。⁶¹ 這些出洋之人成爲了他們家鄉與海外聯繫的橋梁，而他們的行動與帶來的信息也影響着歷史的發展。

口耳相傳的信息傳播方式古已有之，隨着清末報刊數量的增多與流傳面的擴大，報刊也逐漸成爲掌握文字的讀書人獲取新知時事的重要方式。⁶²

58 《西學書目表》記錄甲午戰爭以前20餘年的譯著80多種，近譯之書和中國人言外事之書200多種。參考梁啓超，〈西學書目表序例〉，《時務報》第8冊（光緒二十二年〔1896〕）。

59 和羅師揚同一時期，處境類似的溫州地方文人張桐，也時常在日記中提到他從外出歸來之人身上獲知當今的時事。參考張桐，《張桐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60 據清末（約1907或1908）羅獻修所撰《興寧鄉土志》的「實業」一節，興寧外出各省及南洋經商者有兩萬餘人。

61 羅香林，《年譜》，頁15。關於羅燕賓其人，由於材料所限無法得考，但可知其與羅師揚確有交情，並曾一同於本村昭貽家塾創辦純寧學校，後也曾參與修撰族譜。見《年譜》頁45、52。

62 關於近代報紙這種信息媒介如何傳播及影響閱讀者，可以參考Henrietta Harrison, "Newspapers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19," *Past and Present* 166 (2000): 181-204.

1897年10月起，嚴復翻譯之赫胥黎的《天演論》與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的部份譯文刊登在《國聞報》的增刊《國聞彙編》上，社會反響甚大。此後許多報刊上的評論文章對此多有借用。《天演論》導言諸篇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目的乃是倡國人起而「勝天」。而以「勸學篇」為名刊載的《群學肄言》前兩篇「砭愚」和「倡學」，則是言明「群學」的由來與宗旨。⁶³ 甲午之後的羅師揚讀到嚴復刊登在《國聞雜誌》的《天演論》與《群學肄言》後，「自是喜談物競天擇、優勝劣汰諸說」。⁶⁴ 其撰寫的文章也出現了一些與進化論相關或諸如「群」和「民權」一類流行的理論與詞彙。比如，他在〈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說〉一文中就大量使用「弱肉強食」、「競爭之世」、「益於文明」、「進化」、「人群」、「公群」、「民權」等詞，認為清廷統治者在「萬邦公震夫豪傑」之世，任由「諸異姓割我要隘，吸我脂膏，奪我國權，生殺我同族，予奪我官吏，淫辱我婦女」，「甘為奴隸」，「不思進化」，「故不能有所為」。⁶⁵ 長期身處興寧的羅師揚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文章並受到影響，並將其運用於行文之中，其流傳之廣可見一斑。

不過，用時髦的進化論評論時事的羅師揚，其用作論據的仍舊是「甘為野蠻」的莒子與石敬瑭，以及「不甘為野蠻」的魏孝文帝與完顏阿骨打這些中國歷史中耳熟能詳的人物，題目也是借用孟子的「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的說法。⁶⁶ 也許對此時的羅師揚來說，要消化大量新鮮學說，就需要讓其融入原有的知識體系中。關鍵不在於他是否真正理解這些詞彙與理論，而在於他認同並且確實在使用它們。而通過報刊傳遞的來自西方的理論與信息，相信也豐富了羅師揚的「西學」大雜燴。不久後，「西史」也進入羅師揚的視野，相關情況下節將詳細討論。

自1891年鄉試後從廣州歸來，羅師揚便一直在興寧活動。這一時期的西學蔓延，報刊這類傳播時事的媒體與進化論等新理論新詞彙在社會上的流

63 由於難覓當時的《國聞彙編》，筆者的討論參考了198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復名著叢刊》中的《天演論》與《群學肄言》。

64 羅香林，《年譜》，頁15。

65 羅師揚，〈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說〉，載《山廬文抄》，卷1，頁13，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66 羅師揚，〈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說〉，載《山廬文抄》，卷1，頁13，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行，還是影響到了這位興寧的讀書人，並且不斷充實着他的知識體系。從羅師揚眼中的「西學」與他對進化論的理解和使用，我們看到了「西學」含混的意義，亦從中窺得部份新知從傳播到接受並運用的一個側面。世紀之交，大量的新知時事也經由留洋粵人的口耳相傳豐富着他的信息庫，他的一些「趨新」的行動亦在此時開始。

五、新學堂的興辦

光緒二十八年（1902），37歲的羅師揚終於在壬寅科考中補廩出貢。⁶⁷這個時候，清廷已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多次改革。新式學堂漸次建立，但科舉不廢，學堂難興，學子亦徘徊不前。⁶⁸不過，對羅師揚來說，科舉功名與新式學堂卻並非矛盾。就在他取廩貢的第二年（1903），辦新學的風氣便及至興寧。當年年底，羅師揚的幼年同門蕭惠長自汕頭歸，「盛言同文學堂辦法之善」⁶⁹，遂在興寧發起建立新式的興民學堂，羅師揚積極奔走響應。蕭惠長提及的「同文學堂」即嶺東同文學堂，於1901年在汕頭成立，由嘉應州人丘逢甲與溫廷敬、溫仲和等人主辦，是為粵東第一所新式學堂。自咸豐十年（1860）開放為通商口岸後，汕頭便逐漸成為整個韓江流域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大量潮州和嘉應州的商人、文人在該地活動。⁷⁰在丘逢甲的影響下，粵東多處地方也辦起了新式學堂。⁷¹為了擴大影響力，丘逢甲還被聘為興民學堂首任校長，羅師揚也在此時與丘逢甲有了交往。

興辦學堂之始，經費籌集、校址選定與教職人員的安排都是急需考慮的因素。多年後，羅師揚在《興民學堂小史》中回憶到相關情況說：

得邑紳李君子銘，羅君玉澄，及諸老先生協力贊助。經眾議決，提出愛育堂公款餘銀數百兩為開辦費。……租定城內大衙里李

67 羅師揚等，《興寧東門羅氏族譜》，〈選舉譜〉，「廩增附中」及「貢選」。

68 時人對此多有討論，可參考趙利棟，〈1905年前後的科舉廢止、學堂與士紳階層〉，《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2005年2月），頁8-14。

69 羅香林，《年譜》，頁20。

70 參考陳春聲，〈清末民初潮嘉民眾關於「客家」的觀念——以《嶺東日報》的研究為中心〉，載周雪香、陳支平主編，《華南客家族群追尋與文化印象》，頁49-64。

71 除興寧外，丘逢甲還幫助梅縣、五華、平遠等地辦學。參考丘鑄昌，《丘逢甲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頁119。

氏宗祠及胡屋為校舍，購集圖書器具，廣告招生。⁷²

興民學堂的贊助者之一李子銘，可算是當地的豪強，他在鎮壓太平天國時發蹟，後回興寧辦團練，辛丑（1901）曾至河南滎陽助清廷平亂，官至三品。⁷³ 太平天國以來，地方多動亂，團練大興，各地豪強以此發家的不在少數，獲得他們的支持對興辦學堂作用重大。學堂另外的經費則來自「愛育堂」的「公款」。此「愛育堂」為地方慈善組織⁷⁴，「公」在此處似乎是指憑地方本身的財政力量集結而成的社會組織，處理「共同」事務，如清末廣東廣為設置的「公局」，就是士紳控制鄉村基層社會的一種權力機構，該種機構受到官方認可，實際上也分享了官府的部份權力。⁷⁵ 涉及「公」這一概念，當代學界多有爭論。⁷⁶ 晚清由紳商興辦的各種公益機構，其資金來源也許與官府無涉，但其權力基礎和合法性則往往來自官府。從這個角度看，要為這類機構「定性」——到底它們是屬於「公」的還是「官」的，的確有許多模稜兩可之處。不過，在當事人有意在「公」「官」之間劃清界綫之時，就給了我們一個縫隙窺見「公」這個概念在晚清的涵義了。興民學堂在興辦

72 羅師揚，《興民學堂小史》，寫於民國十二年（1923），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73 羅師揚，〈李公子銘壽序〉，載《山廬文抄》，卷3，頁15-16，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74 慈善組織往往有官辦和民辦兩種，關於愛育堂，筆者並未能在縣志中找到相關資料，其屬於民辦的可能性較大。關於明清慈善組織的研究，參考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日）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有研究者討論了這類公共事務在精英支配地方時所起的作用，參考Timothy Brook, "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Gentry of Ningbo, 1368-1911,"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s. 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27-50.

75 參考邱捷，〈晚清廣東的「公局」——士紳控制鄉村基層社會的權力機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頁45-51。

76 80年代以來不少中國史的學者，如Mary Rankin在其著作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將此「公」的概念與西方「公共領域」的理論聯繫起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公」此一概念在中文裡意義其實是含混的，當李鴻章在奏摺中提到「公款」一詞時，往往也帶有官方色彩，與此同時，地方士紳又往往用「公議」和「公舉」來指稱非官方的公眾輿論。西方公共領域的理論有其使用的脈絡，與中國的「公」並不是一致的概念。

之初發生的一場爭論，正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把機構的性質分爲「公」、「官」和「私」的做法，在清廷頒布的制度章程中亦有所體現。20世紀初，清廷爲時勢所迫，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先後出臺。1904年1月頒行全國的《奏定學堂章程》成爲定制，對大、中、小以及各類師範、實業、方言等學堂均有詳細的規定。⁷⁷其中，《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將高等小學堂分官立、公立與私立三種，並對「官立」與「公立」有如此界定：

城鎮鄉村均可建設高等小學堂，雖僻小州縣，至少必應由官設立高等小學堂一所以爲模範，名爲高等官小學堂。

各省府縣廳州縣，如向有義塾善舉等事經費，皆可斟量改爲高等小學堂經費；如有賽會演戲等一切無益之費積有公款者，皆可酌提充用。凡一城一鎮一鄉一村各以公款設立之高等小學堂，及數鎮數鄉數村聯合設立之高等小學堂，均名爲高等公小學，其建設停止，均應稟經地方官核准。

官立高等小學堂爲地方官當盡之義務，此時事當創辦，務須督同地方紳董細考地方情形，妥籌切實辦法。如有經費已敷，教員已得，而地方官故意延宕不辦，或雖辦而敷衍塞責者，應由本省學務處查明，稟清督撫，將該地方官懲處。如有紳士有從中阻撓者，准地方官稟請將該紳懲處。其有官紳辦理合適宜，推廣日廣者，亦由本省學務稟請督撫將官紳奏請分別獎勵。⁷⁸

從上述章程可見，「官立」與「公立」小學堂之別，關鍵之處也許就在於成立的經費來源。「官立」高等小學堂由「官」設立，且「須督同地方紳董細考地方情形」；而「公立」小學堂使用的，就是「義塾善舉等事經費」，或

77 相關材料參考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還可參考陳寶泉，《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北京：北京文化學社，民國十六年〔1927〕）。

78 《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189-190。

「賽會演戲等一切無益之費積有公款」。聯繫上文所引愛育堂「公款」，可知無論對於官方還是民間而言，「公」和「公款」都具有特定的意義。這種認識似乎也清晰地界定了學校的性質，朝廷亦希望官紳能在辦理官立學堂一事上通力合作，不過實際操作起來，卻並不如此簡單。

興民學堂於1904年2月正式成立，正處於新學制頒行之際。「先是以本校開辦最先，官廳認為高小學校」。⁷⁹ 在羅師揚的回憶中，如何界定這一「高小學校」的性質，似乎有一個需要爭論的過程：

……呈由縣署轉詳，縣署申文以本校為官立。經丘仙根先生力爭，始以公立備案。⁸⁰

這短短的兩句話讓我們看到，新近成立的學堂似乎成爲了一種「官」與「公」爭奪的資源。頗值得玩味的是，這場「官」與「公」的角力以丘逢甲的「力爭」取勝，學校最終以「備案」這種官方承認的方式，被確定爲高等公小學。

我們沒有更多的資料去揭示這場爭論的來龍去脈，也許可以根據上引的《奏定小學堂章程》，去理解爲什麼丘逢甲要「力爭」。在《奏定小學堂章程》的指引下，官立小學堂被期望塑造成「模範」，「延宕不辦」或「敷衍塞責」的地方官要受到懲處，而公立小學堂同樣得到朝廷鼓勵，「紳董能捐設公立小學堂者，地方官獎文或花紅，或匾額」。⁸¹ 一方面，興辦官立學堂爲地方官的「義務」，其建設與經費卻要由地方官自行解決，或相謀於「地方紳董」。這也許可以解釋爲何在興民學堂的個案中，縣署要將其定爲「官立」，這樣方便將學堂納入直接控制的範圍之內，或至少可借之以邀功。另一方面，「官」和「公」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在地方事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地方領袖在此時企圖申明自己「公」的身份，便可以與「官」至少在名義上劃清界綫。建設公立學堂，必然涉及地方「公款」的支用，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地方公立學校的設立，也就是意味着如何分配已有的地方公款以

79 羅師揚，《興民學堂小史》，頁5，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80 羅師揚，《興民學堂小史》，頁2，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81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175。

及如何進一步籌集地方辦學款項」。⁸² 不過，「公款」不足也同樣成爲了日後相當一部份學堂衰落的原因之一。新式學堂與舊學私塾相比，所需費用往往會大爲增加。讀書人在辦學之初可能十分積極，但日後很可能因經費無以爲繼而被迫停辦。⁸³ 就興民學堂而言，羅師揚亦提到，日後的學校擴建不但繼續使用了育嬰堂的「公款」，甚至須賣出其用地以籌集經費。⁸⁴

既是辦學甚早的新式學堂，又與羅師揚關係甚大，興民學堂便值得本文再着墨一二。興民學堂從倡辦到開學，中間經歷了《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出臺。從建校之初的種種變化，可窺見中央政策的落實與地方教育漸爲官方整頓的過程。關於學校的建制，羅師揚曾提到，「先是本校開辦，廣州學務處尙未成立，所有章程規則，多取法嶺東同文學校」。⁸⁵ 在官方規定出臺以前，民間興辦新式學堂，都是無章可循的。既有一個先例在前，向其「取法」是正常不過的事情。在借徑東文以學習西學的嶺東同文學堂啓發下⁸⁶，興民學堂「授國文，東文，地理，歷史，體操，國語，修身等課。」⁸⁷ 東文一課應是受同文學堂影響，但同文學堂講授的經學卻沒有被興民學堂納入課程之中。⁸⁸ 也許，在興辦學堂的潮流之中，於每個投身其中的讀書人而言，其辦學之路都在按自己的理解摸索進行，同時亦兼顧自身涉獵與擅長的領域。

不過，這種自行確定科目與章程的情況只持續了一段時間。從興民學堂的情況所見，《奏定學堂章程》的部份條文從頒布到真正落實，大約經過半年的時間。期間，羅師揚等人經過了一個頗爲艱難的時期，「學校初立，

82 趙利棟，〈1905年前後的科舉廢止、學堂與士紳階層〉，《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2005年2月），頁8-14。

83 參考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鄉村中的社會後果〉，《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頁191-204。

84 民國以後，學校面積不夠，需租用附近祠堂，「仍虞狹隘，爰興眾議，呈准將育嬰堂地召變，得銀二千四百餘。」羅師揚，《興民學堂小史》，頁4，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85 羅師揚，《興民學堂小史》，頁2，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86 丘逢甲曾言，「西學之條目繁，時乎已迫，求其速效，不能不先借徑東文，此本學堂之宗旨也。」丘逢甲，〈嶺東同文學堂緣起〉，轉引自丘鑄昌，《丘逢甲評傳》，頁105-107。

87 羅師揚，《興民學堂小史》，頁2，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88 嶺東同文學堂開辦經學、史學、國文、東文、格致、化學、生理衛生與算學等課程，參考丘逢甲，《嶺東同文學堂開辦章程》，載丘晨波主編，《丘逢甲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頁304。

學究橫加非議，學生迭起風潮，幸李君文連，羅君玉澄等協持於外，蕭君惠長，羅君則恆等整齊其內，又得仙根先生鼎力斡旋，始不為所動」。⁸⁹ 學堂初設，「學究」非議，學生「迭起風潮」也是當時不少新式學堂面臨的問題，個中涉及「新舊」交替之時地方的利益糾葛。而其時不少所謂新式學堂往往只是換了一個牌匾，課程單調，教員不識新學，教習專橫，管理混亂甚至腐敗，學生的失望自是難免。⁹⁰ 當時的《蘇報》就專闢「學界風潮」，長篇累贅地報道了新式學堂初創時候的風潮。⁹¹ 而於興民學堂來說，學潮問題得到解決，其過程也頗值得玩味。「協持於外」的人估計指的是贊成新學的地方勢力，牽涉到贊成「新」的勢力如何最終在地方豎立威望，「整齊其內」的便是摸索着辦學的讀書人，而當時擁有一定資源和聲望的丘逢甲在「鼎力斡旋」也至關重要。

半年多後學務處成立⁹²，經官方整頓地方教育後，興民學堂也發生了一定變化，興民學堂校長丘逢甲則在當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學務綱要》中提到，「於京師設立總理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於省城各設學務處一所，由督撫選派通曉教育一員，總理全省學務，並派講求教育之正紳參議學務。」⁹³ 學制系統與教育行政系統分開後，各地教育也受到了專門的行政機構的管理。⁹⁴ 1904年冬天，丘逢甲被兩廣總督聘為廣東學務，當初與羅師揚等人一同倡辦興民學堂的王蔚奇則成為練習員，先後赴廣州。⁹⁵ 在地方

89 羅師揚，《興民學堂小史》，頁2，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90 1904年初，張百熙等上奏的《重訂學堂章程》中寫道，各省初辦學堂，「學生率皆取諸原業科舉之士」，他同時認為這是造成一些學堂風潮的原因，「學生未嘗經小學堂陶熔而來，不自知學生之本份，故其言論行爲，不免有軼於範圍之外者」，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頁289。

91 《蘇報》對學潮的報道主要是為了配合革命黨人的宣傳，但也反映了其時學潮的普遍性。1904、1905年的《申報》、《大公報》、《東方雜誌》等流傳甚廣的報刊都對學潮問題有相關報道。

92 學務處是附屬於總理學務大臣的機構，學務處成立後的職責之一，就是督促各地辦學，並使之規範化。關於新學制下學務大臣與地方學務的討論，參考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二章。

93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學務綱要〉，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98。

94 相關討論參考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二章。

95 壬寅學制之後，學務日繁，廣東學務處便成立於壬寅學制之後。參考〈廣東學務處札

上積極辦學，為興民學堂爭取「公立」地位的丘逢甲搖身一變，成為了廣東官方整頓教育的領導者。不久，丘逢甲因事務纏身辭去興民校長一職，繼任者便是赴廣州的練習員王蔚奇。學務處成立後，培養了大批地方士子作為轉達政策的中介。興民學堂在「王君蔚奇練習回校」之後，「一一按照新章辦理」⁹⁶，興民學堂從此亦必須「有章可循」地受到官府的管理。以科目為例，「東文」就不得再講授了，因《學務綱要》有云，「初高等小學堂，以養成國民忠國家尊聖教之心為主，各科學均以漢文講授，一概毋庸另習洋文，以免拋荒中學根柢。」⁹⁷

學制變革的影響也使原有的族學面臨改革。在此潮流中，羅師揚倡辦了興寧第一家新式族學。1905年2月，羅族的家族植基學堂成立，羅師揚被推為校長，校址在邑城雪洞里羅族宗祠。⁹⁸ 清末學制變革，官方需要考量如何將舊有的族學資源整合入新的教育體系中。與此同時，大族面對新的政治語言，往往又會對其加以利用。舊式族學就承擔了蒙學的功用，而新學制下最基礎的學堂是小學堂，因而，族學在新學制下便多以初等或高等小學堂的形態存在。《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中有云，「凡有一人出資獨立設一小學堂者，或家塾招集鄰近兒童附就課讀」的屬於初等私小學⁹⁹，實則默許了族學在新體制下的存在。而1910年頒行的《改良私塾章程》則明確定下了包括「就義莊或宗祠內設立，專課一姓子弟」的「書塾」在內的私塾改良成「初等小學」與「高等小學」的步驟。¹⁰⁰ 有統計表明，清末的私立學堂就有相當多的一部份是由包括宗族「書塾」在內的各種私塾轉變而來。¹⁰¹ 新式族學在晚清

文)，《嶺東日報》，1903年12月7日。

96 羅師揚，《興民學堂小史》，頁2，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97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學務綱要〉，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86。

98 羅香林，《年譜》，頁21。

99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174。

100 參考《改良私塾章程》，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311-313。《改良私塾章程》中將私塾進行了分類，包括「甲，義塾，係官款或地方公款設立，專課邑中貧寒子弟者；乙，書塾，就義莊或宗祠內設立，專課一姓子弟者；丙，一家或數家設塾，延師課其子弟者；丁，塾師自行設館，招集附近學童教授者。」

101 趙利棟，〈1905年前後的科舉廢止、學堂與士紳階層〉，《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2005年2月），頁8-14。

頗為普遍，不少還在民國屢次學制改革中延續了下來，民國時新建的情況也頗為常見。¹⁰²

清廷對初等小學堂的宗旨有如下界定：「令國民七歲以上者入焉，以啓其人生應有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¹⁰³ 在對「國民」教育的強調下，官方也從宗旨上利用現代國家的觀念，將新式的小學堂納入到培養「國民」愛國這一邏輯之中。¹⁰⁴ 因此如何由「國」及「家」，成爲了地方大族詮釋這套語言時需要面對的問題。十年之後，在1914年的校慶致詞上，羅師揚便就學堂的始建強調了「家」和「國」的關係，言「國也者，合人群而成焉也；家世者，賴國力以存焉者也」云云。¹⁰⁵ 就寧東羅族而言，其族譜云舊日「各房學齡子弟尋常以送入私塾經館爲多」，就近入讀爲主¹⁰⁶，原來並無族學。1905年創設新式族學，其意義也許在於巧妙地運用了兩套語言——宗族和國家，建立起一個既爲國家承認又能夠集結宗族資源的機構。

六、教材的編撰：「西洋」與「亞洲」

新式學堂既立，教員亦必須針對新設置的科目選擇或編撰教材。任興民學堂「文史教員」的羅師揚，負責課授「國文與中西歷史」。興民學堂初設

102 除了羅獻修在《興寧縣鄉土志》中提到興寧新式族學的情況外，筆者亦在宣統《高要縣志》，〈學校志〉中找到不少新式族學的記載。至於民國的情況，修於1927年的《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學校譜〉中就載有不少羅家的族學。如此時的家族植基學校已經改名爲「私立植基小學校」，除此之外，羅家還有設立於1920年的「私立以彩小學校」，設於1922年的「三楓國民學校」等等。

103 參考《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174。

104 有關清末「國民」與「國家」觀念的形成和解釋，可參考王泛森，〈引論：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載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上），頁1-30。有學者認爲，清廷鼓吹的「國民」觀念接近英語「national」而非「citizen」的定義，強調的是人民對國家或政府的義務。針對清末教育改革中官方鼓吹的「國民」觀念，可參考程美寶，〈由愛鄉而愛國：清末廣東鄉土教材的國家話語〉，《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68-84。

105 羅師揚，〈植基學校十週年紀念大會致詞〉，《山廬文抄》，卷1，頁19，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家世者」可能是「家也者」的誤植。

106 羅師揚等，《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學校譜〉。

之時，新學制尚未落實，其時課程設立較為自由，由該科任課的教師自行編撰教材的情況也頗為常見。羅師揚就是自己編制西洋史教材的。在1904年編撰的教材中，他在「概序」裡對西洋史有如下勾勒：

昔埃及於尼羅河畔，肇開文化，與諸國相往來，而人文發達之基以定。迨希臘征服各邦，並有歐東之文化，而學術蒸蒸日上矣。……近世以來，各國割據一方，群相峙立……降及現世，泰西各國……爭機亦日以烈，甚且波及於他洲。嗚呼！東洋世界，自此投入漩渦中心矣。關心時局之士，亦將怦然而動乎！¹⁰⁷

羅師揚這個西洋史的大綱，與同時期廣府中學堂採用的《西洋史要》的「按語」可謂不謀而合。該按語說：

上古自埃及起尼羅河畔，首創文化，與諸國爭霸，西亞之智識相灌輸，而人文發達之基礎以立……而各國競爭未有已，兵威所蹀躞，勢力所膨脹……東洋之無地，亦覆入漩渦之中，而靡所終極焉。¹⁰⁸

筆者雖然無法考證羅讀過哪種相關的史書，但其對西洋史綫索的勾勒，與這本《西洋史要》確有相當多類似之處。此書的編者是日本的小川銀次郎，由金粟齋譯書社在1901年10月出版，屬漢譯西洋史教科書之一。甲午之後，翻譯包括史學教科書在內的日本著作蔚為潮流，市面也出現大量中譯日本的西洋史書籍，小川這本便是其中之一。¹⁰⁹

新學制頒行全國後，官方對西洋史的課授也有一定規定，並提出「選外國教科書實無流弊者，暫應急用」。¹¹⁰教科書需求大增，而國人尚無力自行

107 羅師揚，〈西洋史概序〉，《山廬文抄》，卷2，頁25，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08 筆者所見《西洋史要》版本是廣府中學堂課本，上標「戊巳班史學」，「學部審定中學用本」，由徐紹榮編，清風橋文茂印書局承印，具體出版時間不詳，應在學部成立（1905）之後，但在官方審定以前，《西洋史要》一書在中國已經可見。

109 參考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開放時代》，第145期（2001年1月），頁48-56。

110 新學制規定中學堂、部份相關的高等學堂與大學堂分別課授「歐洲美洲史」、「西

編訂，可供使用的西洋史教科書多譯自日本。「泰西可譯之書多矣，而史爲要，史不勝譯矣，而以日東名士所譯之史爲尤要。」¹¹¹ 翻譯西史首選日本，已成了時人的基本共識。羅師揚「西洋史」概念的形成，無疑受此潮流影響甚巨。其實，包括小川銀次郎所編《西洋史要》在內的多本日本西洋史教科書，隨後也經學部審定爲各學堂應用書目。¹¹² 不過，羅師揚撰寫西洋史講義之時，雖與新學制頒行的時間相近，但該時學制尚未在興寧落實。也許，類似的西洋史著作在官方確定以前已流傳甚廣。我們可以推測，羅師揚的「西洋」史觀，很可能是來自日本的。可惜新學制落實後，這門課程估計要面臨取消，因爲根據《奏定小學堂章程》，高等小學堂不但不能教授外國語言，歷史也只需課「中國歷史」，並且「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變遷，以養成國民自強之志氣」。¹¹³

從西洋史的編撰，可以看出羅師揚對「西洋」世界的一些認識，而針對他筆下「投入漩渦」的「東洋」世界，羅師揚亦因課授亞洲史的課程而有一定涉及。1910年10月，丘逢甲電聘羅師揚任兩廣方言學堂文史教員，課授亞洲各國史、中國近代史與倫理學等課。¹¹⁴ 於是，羅師揚離開從教六年的興民學堂，來到廣州的方言學堂授課。兩廣方言學堂成立於1906年，由兩廣遊學預備科館和廣州譯學館合併而成，是晚清學習外語語種較爲完備的一間學校。¹¹⁵ 根據清末學制，京師大學堂附設之譯學館與各地方方言學堂，除了講授「外國文」和「專門學」，還需講授「普通學」。「普通學」內就包括有

洋各國史」與「世界史」，分別參考《奏定中等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與《奏定大學堂章程》中的相關條文，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

111 《歐洲歷史攬要·序》，長水敬業學社1902年譯印，轉引自李孝遷，〈清季漢譯西洋史教科書初探〉，《東南學術》，2003年，第6期，頁130-140。

112 據《京師大學堂暫定各學堂應用書目》、《學部官報》統計，除了《西洋史要》外，官方審定的西史教科書中譯自日本的還有《萬國歷史》、《世界近世史》、《亞美利加洲通史》和《萬國史綱》，佔了總數的一半以上。參考李孝遷，〈清季漢譯西洋史教科書初探〉，《東南學術》，2003年，第6期，頁130-140。

113 參考《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189。

114 關於羅師揚所授課程，參考羅香林，《年譜》，頁20。

115 參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頁71。

「中國歷史」、「亞洲各國史」與「西洋史」。¹¹⁶

爲了教授亞洲各國史的課程，羅師揚自行編纂了《亞洲史》講義兩卷。卷一包括日本史、朝鮮史與暹羅史，卷二包括安南史、緬甸史、印度史、波斯史與阿富汗史，附錄包括中亞諸國史與馬來西亞群島諸國史，各國歷史的詳細程度依次遞減。¹¹⁷ 當時清政府雖設有編譯局，專管編輯教科書事宜，「惟應編各書，浩博繁難，非數年所能蕆事，亦斷非一局所能獨任」，因而「其私家編纂學堂課本，呈由學務大臣鑑定，確合教科程度者，學堂暫時亦可採用，准著書人自行刊印售賣，予以版權。」¹¹⁸ 羅師揚所撰的教科書，便是在這種官方靈活的政策下出現的。在一個讀書人可以自由編撰教科書的時代，羅師揚選擇記載上述國家的歷史作爲「亞洲史」的內容，並且有詳略側重的考慮，這種處理「亞洲史」的觀念究竟從何而來？

從《奏定學堂章程》可見，羅師揚所要講授的「亞洲各國史」，在中學堂、高等學堂第一類學科，文學科大學之萬國史學門與京師大學堂附設之譯學館中，均有明確規定。其中，《奏定中學堂章程》對中學堂所課授之「亞洲各國史」進行了清晰的界定：

……次講亞洲各國史：先就日本、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印度、波斯、中亞細亞諸小國講其事實沿革之大略，宜詳於日本及朝鮮、安南、暹羅、緬甸，而略於餘國；詳於近代而略於遠年。¹¹⁹

可以看出，在內容與詳略安排上，羅的講義都基本符合官方的要求。自上而下，這種「亞洲各國史」的認識可謂頗具代表性。要討論此種觀念的形成，就無法避開「亞洲」的概念。有研究者指出，「亞洲」一詞源出古希臘，是一個出自「西方」的概念。17世紀以後，「亞洲」的形成又和歐洲的

116 參考《奏定譯學館章程》，選自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877-880。還可參考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高等教育》之「方言學堂」（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117 羅師揚，《亞洲史》，撰於宣統三年（1911），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18 《奏定學務綱要》，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501-502。

119 《奏定中學堂章程》，收入朱有瓚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頁385。

殖民擴張相關。¹²⁰ 葛兆光指出，中國「長久以來只有『中朝』與『四裔』的觀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學的空間說法，才有『亞洲』的意識。」魏源著《海國圖志》時雖已有了對五大洲的劃分與亞洲的說法，但他更多的還是沿用「東洋」、「西洋」、「小西洋」、「西南洋」一類的稱呼，指中國之外的地區。¹²¹ 到了19世紀末，開始有人批評「中人特稱日本曰東洋，而不知己亦國於東洋也」¹²²，顯示當時「東洋」的意義已發生變化，並有人意識到中國亦身處其中。將「東洋」和「亞洲」劃上等號的則是日本，梁啟超就認為「日本人所謂東洋者，對於泰西而言也，即專指亞細亞洲是也」。不過，「東洋史之主人翁，實惟中國，故凡以此名所著之書，率十之八九紀載中國耳」¹²³，也就是說，日本的「東洋史」幾近等於「中國史」。實際上，學制改革後中國翻譯日本「東洋史」乃至「支那史」的著作，亦是大多作為「中國歷史」的教材使用。這樣看來，雖然日本的教材在中國被廣為採納，但其「東洋史」並未對「亞洲史」的編撰產生直接影響，那官方乃至羅師揚的亞洲史的觀念又是來自何處？

在羅師揚講授「亞洲史」以前，「亞洲」已受到關注。梁啟超在1902年寫成〈亞洲地理大勢論〉¹²⁴，就對亞洲的疆域有比較清晰的描述。而與羅師揚所撰《亞洲史》同時期的《兩廣方言學堂地理講義》中對「亞細亞洲」之「疆域」的交待，亦與梁啟超的認識相類：

本洲位於東半球之東北……東與阿美利加洲相對，界以太平洋

-
- 120 參考汪輝，〈亞洲想象的譜系〉，<http://column.bokee.com/4987.html>。關於「亞洲」一詞的來源，汪輝認為，「Asia這個詞最早是指希臘以東的地區，還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安拉盧西亞一帶。在早期的歐洲人的概念中，亞洲就等於東方的意思。」
- 121 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開放時代》，第145期（2001年1月），頁48-56。「東洋」與「西洋」在明清時期多指後世所說的「南洋」。
- 122 〈港報論東洋大局〉，《時務報》，第13冊（光緒二十二年〔1896〕）。此外，《時務報》上多有國外新聞的翻譯，可以看到「東洋」或「東亞」局勢得到日本報刊的相當關注。
- 123 參考梁啟超，〈東籍月旦〉，《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一冊），文集之四。關於日本東洋史和支那史的編撰，參考李孝遷，〈清季支那史、東洋史教科書介譯初探〉，《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頁101-110。關於日本的東洋學，參考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六章，「遊歷與新興東洋學」。
- 124 梁啟超，〈亞洲地理大勢〉，《飲冰室合集》（第二冊），文集之十。

為中國南海，暹羅海，孟加拉海，印度海，阿拉伯海，而澳大利亞洲在其東南。西南處與阿非利加州之埃及接壤。西北一隅以烏拉山之屏蔽，則為亞歐兩洲陸地相連之界。¹²⁵

可以看出，這種疆域觀與今日對亞洲的認識相去不遠。然而，受歷史書寫者觀念的影響，「亞洲史」涵蓋的範圍，其實並不等於亞洲作為一個地理疆域內存在的所有國家或民族的總和。羅師揚就提到他的寫史就是「國家何以成立，何以改遷；民族何以競爭，何以結合；社會風俗之何以起原（原文為原，「源」之意），何以發達」。¹²⁶ 哪些國家會被寫入「亞洲史」，或許亦意味着在羅師揚的認識體系中，哪些國家才有他認為的「歷史」。

由於這門課在不少學堂都有講授要求，相信同類教材在羅之前就已經廣為流傳。羅師揚在序言中就提到了他的選材的來源：

竊謂兩廣方言學堂之設，所以造就外交人才。其於諸國外交之事，首當注意。乃取中國廿四史外夷傳，及近日中外人士所述之亞洲諸國事而刪撰之。¹²⁷

關於「近日中外人士所述之亞洲諸國事」，筆者在廣州能夠找到兩本羅之前關於「亞洲各國史」的著作，一本是徐紹桀編訂的廣府中學堂課本¹²⁸，另一本則是1908年粵東編譯公司出版由伍瑤光編訂的《亞洲各國史》。羅師揚的講義與廣府中學堂的課本相比，體例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僅多一附錄。而伍瑤光編的《亞洲各國史》則在討論了亞洲的疆域、人種與範圍後，分期按國別敘述「各國」歷史，牽涉的各「國」也與羅師揚的講義相去不遠。但值得注意的是，伍還在前言中強調了其本人不同意「近世學者編亞洲史，專詳於中、東、南亞諸國，而於西亞之小亞細亞，則附於西洋史中」的做法，因為「嘗考亞細亞之名，實始於百爾加摩王獻其國土於羅馬，羅馬以其地為亞細亞洲。述亞洲各國史，於其地反不及，是數典而忘其祖也。」¹²⁹ 此處便

125 《兩廣方言學堂地理講義》，「疆域」，作者與出版時間不詳。

126 羅師揚，《亞洲史》，〈自序〉，頁1，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27 羅師揚，《亞洲史》，〈自序〉，頁2，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28 徐紹桀編，《亞洲各國史》，廣府中學堂課本，「戊巳班史學」（廣州：清風橋文茂印局，具體出版時間不詳）。

129 伍瑤光編，《亞洲各國史》（潮州：粵東編譯公司，1908），「總論」，頁4。

可看到伍羅兩人的不同做法：伍將「小亞細亞」的歷史編入書中，並有意強調之，而羅師揚則與伍所不滿的「近世學者」一樣，將小亞排除在外。正如前文討論的，包括小亞細亞在內的「亞洲」疆域在當時已有共識，如果把時人編「亞洲各國史」時多忽略「小亞細亞」歷史視為一個角度，並考慮清廷對「亞洲」各國歷史所畫定的範圍與詳略規定，也許能從中窺得「亞洲各國史」一些選材原則及其背後的觀念。

在上引《奏定中學堂章程》中，清廷對「亞洲各國史」中亞洲的「各國」進行了清晰的界定，當中同樣沒有囊括「小亞細亞」的國家。加之其對日本及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必須詳細講授的要求，從中似乎可見一種天朝觀念的延續。除了地緣關係的密切外，上述幾處都曾經是中國的藩屬國。清代時日本雖非藩屬國，但其在近世對中國的影響甚大，一躍從「互市國」之一到必須詳細講授的日本國史，也就不顯意外了。而印度、波斯與中亞細亞諸小國與朝廷的關係，就相對處在「同心圓」的「天下觀」更遠的「化外」，小亞細亞所包括的地域更是長久都處於與中央王朝體系和視野相距甚遠的世界¹³⁰，這也許正是官方對「亞洲各國史」的教授要求中，印度、波斯的歷史從簡，而小亞細亞的歷史被略去的原因。

其實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朝廷的章程與教科書的編撰中，梁啓超對亞洲地理大勢的討論，也僅在討論疆域時把小亞細亞包括入內，在言及文明、人種、民族等方面的時候都會把其排除在外，還會作出「西伯利亞部，劣等黃人種居之；支那部，高等黃人種居之」等判斷¹³¹，中國的優勢地位十分明顯。此種情況似乎可以說明，晚清時起碼存在兩個「亞洲」，一個是按照西方地理學分類中五大洲之一的「亞洲」，其疆域延伸到了小亞細亞；另一

130 濱下武志把亞洲視作一個區域進行研究，地方、土司和土官、藩屬、朝貢、互市等的區分是在中央王朝朝貢體系下同心圓的位置由內至外。參考濱下武志著，朱蔭貴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31 梁啓超在1899年的〈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中，就對人種有了界說。梁啓超有關亞洲地理的討論，參考〈亞洲地理大勢〉，《飲冰室合集》第二冊。有學者認為，種族觀念在晚清的討論從梁啓超等人開始，帶有相當的政治意味。通過對黃種、白種、黑種等人群的劃分與等級高低的區別，「種族」成了「一個虛構的具有生理凝聚能力的符號，能夠在面臨外國侵略時候增強地域性的團結、維繫對於世族的忠誠」。馮客（Frank Dikotter）著，楊立華譯，《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66。

個則是在中國大部份歷史教科書中帶有歷代「天下觀」的影子的「亞洲」，「小亞細亞」的歷史在當中往往被排除，並附屬到了亞洲以外的「西洋史」中。時人討論「亞洲」的時候，仍可見以中華為中心的觀念，西方人種學理論的傳入，恰恰被用作解釋的工具。¹³² 羅師揚的「亞洲史」編撰，便讓我們看到了這個有着「天下觀」印記的「亞洲」。

此外，廿四史的「外夷傳」是羅師揚的講義的另一個來源。這種以古代歷史界定當代地理的敘述亦可在文中得見。他在討論「朝鮮史」的時候，開篇便言「朝鮮半島，屬於中國之東北隅，於古為九夷地……周武王伐殷而後有中國，乃封箕子於朝鮮。」「安南史」中也言，「安南於古為蠻夷地，秦時闢地極遠，於南邊置象郡、林邑、交趾、日南諸郡……」對暹羅、緬甸等地的描述，也頗有凸顯中央王朝的中心地位之意。¹³³ 事實上，羅師揚這種觀念也持續到了民國。三年後當他提到清末以來列強的殖民時，言甲午之後「泰西諸強國，遂挾其莫大武力，競集矢於東亞，奪我藩服，據我軍港」云云，仍舊把「東亞」受殖民之地視作「我藩服」，其觀念與撰寫的「亞洲各國史」並無大異。¹³⁴

同時，「外夷傳」也影響到了「亞洲史」的編排。羅師揚等人「亞洲史」的編撰，也許都首先界定了亞洲中有「史」之國，再據此選擇材料按國別編寫。不少人對此預設已有共識，但也有像伍瑤光這樣，編書時通過「考證」得出時人把小亞細亞歷史排除在外是「數典忘祖」的做法。習慣於「中朝與四夷」觀的國人對「亞洲」此一概念的使用還不是很熱衷，但是面對歐人的殖民，有時又需要把「亞洲」視作一個整體進行討論。¹³⁵ 亞洲各國史的編撰，也許可以看成是這種觀念在歷史編撰中的投射。然而，「外夷傳」的信息顯然是不夠的。筆者猜測，晚清翻譯日本歷史教科書，也多有一些按國別分述的如「朝鮮史」、「安南史」、「印度史」一類的史書，關於日本本

132 20世紀初，西方人種學理論傳入後，「種族」、「人種」等詞逐漸被大量使用。相關討論參考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及Pamela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990): 1-34.

133 參考羅師揚在《亞洲史》中「朝鮮史」、「安南史」等處討論。

134 羅師揚，〈植基學校十週年紀念大會致詞〉，《山廬文抄》，卷1，頁17，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35 參考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開放時代》，第145期（2001年1月），頁48-56。

國歷史的就更多了。¹³⁶ 或許這些教材的編撰者在朝廷章程與自身對「亞洲」認識的基礎上，從這些著作中剪裁信息，編成今日我們所見之「亞洲各國史」。如果說，「亞洲」是一個被想象的共同體，那麼亞洲史的編撰也許是一種想象的方式，在此過程中，包括羅師揚在內的不少身處「亞洲」的讀書人，將其想象撰寫成文字，並在課堂上傳播。¹³⁷

七、「文人」、縣長、黨員：「新世紀」的從政實踐、角色與觀念

清末的最後幾年，羅師揚獲得信息的途徑大增，活動範圍也有了變化。在興寧教書之時，羅師揚經常能看到興寧老鄉、革命黨人何天炯（1877—1925）自日本郵寄至興民學堂的《民報》，亦有門徒向他郵寄省城學者的講演。在1910年他也因兩廣方言學堂的教職而停留在省城。1911年，黃花崗起義在廣州爆發。不久，鼓吹革命的《別溪雜誌》出版，是為興寧、長樂兩邑同盟會的機關報。同盟會發起人之一張花谷與羅師揚一直相交甚密。武昌起義後，羅師揚門人弟子「出而奔走革命」的也頗多。辛亥革命後，政壇多變，廣東成為革命黨人活動的重地，當中更不乏以客家話為母語之人。在興

136 晚清翻譯日本歷史著作，也有相當部份是按國別編撰的，如上海教育世界社1901出版的《日本歷史》，上海點石齋1903年出版的《朝鮮史》，閩學會1903年出版的《印度史》，上海教育世界社1903年出版的《安南史》，上海廣智在20世紀前10年出版的「史學小叢書」，有《波斯史》、《阿拉伯史》、《亞細亞巴比倫史》、《猶太史》等等。參考譚汝謙主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137 班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着力於探討「民族」如何在東南亞地區被「想象」，民族主義如何出現並傳播的過程。由於東南亞有着殖民的歷史，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然而，該書也帶出一個思考的問題：一個怎樣的共同體被什麼人、通過何種方式想象？清末局勢日危，加之日本「亞洲主義」的影響，五大洲的劃分漸漸流傳之際，「亞洲」的使用者們也許都在對其進行着想象：亞洲是什麼？葛兆光就提醒我們注意幾個問題：「亞洲」是哪一個「亞洲」？是東亞，還是包括了西亞、中亞和南亞的整個亞洲？「亞洲」作為地理學的一個空間如何可以成爲一個文化認同空間？日本所認同的「亞洲」，是否就是中國和韓國也都認同的一個政治或文化共同體？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參考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開放時代》，第145期（2001年1月），頁48-56；班尼迪克·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著，吳睿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寧，「光復」運動則是以士紳組織學生軍、商團軍及各鄉義勇起而宣布獨立，並將原縣令遣返的形式進行，其後在局勢動蕩之時，士紳更以實現興寧的「自治」的名義，與中央政府劃清界綫。¹³⁸ 政權更迭，這些人與政府的關係亦頗為微妙。以此為背景考察羅師揚在民國初年的處境、歷程與觀念，將是本節的主要內容。

近代政治體制自清末始逐漸形成，羅師揚正是在此潮流中步入新民國政壇。1911年底，他被推為廣東省臨時省議會代議士。¹³⁹ 中華民國成立後，胡漢民再次督粵。時任廣東省陸軍司兼稽勛局事的舊識鄧仲元聘羅師揚為陸軍司及稽勛局文牘。在這份類似幕僚的工作中，羅師揚多是參與討論和起草一些官文。¹⁴⁰ 年譜還提到，1912年秋朝鮮方面曾派人赴廣東，與粵中軍政當局商量幫助朝鮮獨立之事。鄧仲元與下屬討論後，由羅師揚成《移民實邊策》覆之。¹⁴¹ 不日，羅師揚受命至東北三省考察。同行的羅藹其亦在日記〈壬子旅行記〉中提到，「此次調查，係以農林礦牧為目的，而以移民實邊為宗旨。此屬於國防之計劃」¹⁴²，或可映證「移民」的考慮確是曾有之事。

此時的羅師揚並非革命黨人，但他在政壇的際遇，卻一直受粵省革命黨人的活動影響。先是粵中政局變化，羅師揚等人不得不提前於1913年3月返粵，所謂的移民實邊策胎死腹中。其後革命黨人在二次革命中失利，龍濟光入據廣東，掌握廣東軍政大權。作為廣東革命黨人的中堅，鄧仲元被袁世凱政府通緝，被迫出亡日本。其時出任臨高縣知事的羅師揚也被迫返回興寧，重拾教鞭。至1917年護法運動，他又被革命黨人重新推進政壇。此時，支持護法運動的陳炯明與鄧仲元等成立粵軍。鄧向惠潮梅督辦陳炯明推薦這位昔

138 參考黃其藻編輯，羅師揚校訂，《興寧鄉土歷史》之相關論述。

139 臨時省議會採取代議制，取消議員資格的財產和功名限制，試圖與清末地方自治中成立的咨議局劃清界綫。參考廣東民國史研究會編，丁身尊主編，《廣東民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107-109。

140 如羅師揚，〈為停給長糧告已遣散各民軍官長書（代鄧仲元）〉，《山廬文抄》，卷5，頁4-5，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41 當時朝鮮的局勢仍不明朗，此事似乎還有更值得探討的餘地，因資料所限，只能日後再追查。

142 參考羅藹其，〈壬子旅行記〉，載《興寧文史》，第26輯（2001年11月），頁222。日記以稽諸史籍考東三省風物為主。就上述內容而言，可以特別參考10月23日、10月30日、11月9日、11月12到13日、11月18日、12月1日、12月6日、12月16日的日記。

日的「文牘」，羅師揚遂應陳炯明之聘任督辦署秘書，於1918年初隨陳鄧的援閩粵軍至福建。¹⁴³

該年底，羅師揚成〈屯田策上陳鄧二君〉（後簡稱〈屯田策〉）一文。從〈屯田策〉的內容及其命運，頗可以窺得其時羅師揚的視界與處境。他以「竊聞板蕩之秋，用兵者多以屯田為上策」開篇，使用了諸葛亮伐魏時候屯田的例子，而福建則「界山海之間，幅員偏小，除漳泉福州數屬以外，皆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而「梅花十八洞」猶宜實行墾田這一措施。因為該地土質膏腴，但明代盜賊起，平定後戶口凋零，所以「今宜先往調查」云云。¹⁴⁴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羅師揚眼中的「屯田」與歷代的舉措相去不遠，另一方面，羅師揚事先並無調查，更無荒地的統計數據，不過道聽途說，只可算是紙上談兵。援閩粵軍是當時國民黨唯一的軍隊，最終任務還是要重回廣東，奪取政權。加之廣東政壇的軍閥糾葛，陳炯明意在拓展勢力，並無長久停留閩南之意，此時提出的〈屯田策〉自是難為陳所注意。¹⁴⁵

羅師揚的門生羅梓材曾言：「世率以文人目先生。於先生當日建議，每漠然置之，謂迂闊不切實用」¹⁴⁶，其在政壇的角色與處境可見一斑。其實，就羅師揚的眼界而言，「文人」一說亦恐非空言。無論是其從事的幕僚職位，曾以歷代方志作為重要參考¹⁴⁷，還是他作為代議士在臨時省議會提出的一些不太合時宜的議案，以及此次的屯田策，都難脫「文人」的目光。這種尷尬的身份無疑貫穿在羅師揚的從政實踐之中。而當他被調任臨高縣、連城縣等地的知事時，又不得不面對民初廣東各地盜賊蜂起的狀況，主要任務往

143 關於陳炯明的這次援閩，參考陳炯明，〈援閩誓師詞〉、〈援閩粵軍出師通電〉，載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頁282、288。

144 羅師揚，〈屯田策上陳鄧二公〉，《山廬文抄》，卷5，頁1-4，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45 參考羅翼群，〈記孫中山南下護法後十年閩粵局之演變〉，載政協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頁105-160。

146 羅梓材，《山廬文抄》，〈序〉，頁3，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47 1913年，羅師揚任瓊崖鎮守使秘書時，就所閱之方志文集十一種作一「讀書錄」，對瓊崖的沿革歷史與自然災害等大事作了一梳理，以作參考。見羅師揚，〈檢瓊海公餘讀書錄示香林男〉，民國十六年（1927），《山廬文抄》卷5，頁20-30，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往是「籌餉剿匪」。¹⁴⁸ 1919年底，羅師揚辭職返家，又一次投身教育。當他回到老家興寧，從政的際遇與讀書人的身份又有否影響到他的所思所行？

其實在民元以後，羅師揚就不止一次在公共場合對前清的「千年獨裁政體」表示不滿，而認可「民主共和」。在他所撰之壽序與誄辭中，也涉及許多與國民黨政權相關之人。加之本人的從政經歷，他在返鄉後積極籌建國民黨興寧分部，並於1922年被推為分部部長，也就不足為奇了。¹⁴⁹ 但同時，羅對政局的多變顯然是非常無奈的，「民國以來，國事蝸蟻，半由武夫政客，動輒以權利為歸」。¹⁵⁰ 以至再次被鄧仲元邀「出山」時，他並無太大期盼，卻更多從經濟的角度考慮。¹⁵¹ 事實上，羅師揚的圈子中大部份是與他遭際相似的讀書人，他們同樣倡新學，同樣在新政權中沉浮，宦途失意後也同樣回到家鄉重執教鞭。也許正是在他們身上，羅師揚才會有惺惺相惜的共鳴。

在當地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中，羅師揚同樣面對了種種利益糾葛。他曾代表興寧出席全省教育會議，為重建橋梁、建設醫院籌集經費，為《寧江週報》致創刊詞，與「邑紳」呈請縣政府轉呈粵省府撤銷在興寧設花捐的成命，建議縣政府嚴禁妖巫之術等等。¹⁵² 他也關注到在興寧施政的困難：為修築粵東鐵路在「士紳」中籌款遇到困難，學校經費不足，因「紳耆」推諉而難募造林修河之經費，欲新設管理衛生事業之局等舉措因「愚民頑固」難以推行。¹⁵³ 其實，在縣署組織編撰的《寧江週報》中，就有不少政府與地方大

148 參考羅師揚，〈檢瓊海公餘讀書錄示香林男〉，民國十六年（1927），《山廬文抄》，卷5，頁20-30，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也參考羅香林，《年譜》，頁40。

149 他曾提過，「千年獨裁政體，一變而為民主共和，斯誠一國之民所大償宿願之事」，〈興民中學民五國慶行禮訓詞〉，《山廬文抄》，卷1，頁17，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不過，就筆者所見材料，無法得知羅師揚加入國民黨的確切時間。

150 羅師揚，〈植基學校十週年紀念大會致詞〉，《山廬文抄》，卷1，頁18，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51 羅師揚，〈與陳少岳先生〉，《山廬文抄》，卷5，頁12-13，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52 參考羅師揚《山廬文抄》中收入的〈興寧建設醫院醴金冊序〉等多篇序文。有關民國年間風俗改良以及其落實情況，參考潘淑華，〈建構政權，解構迷信——1929年至1930年廣州市風俗改革委員會的個案研究〉，載鄭振滿、陳春聲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108-122。

153 參考羅師揚，〈寧江週報發刊詞〉，《山廬文抄》，卷1，頁20-23，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寧江週報》的主編陳才虎，也是當年清末同盟會機關報《別溪雜

族間衝突的報道。¹⁵⁴ 我們知道，辛亥「光復」時「士紳」曾在興寧起到決定作用。而在1917年廣東當局派軍隊將叛變的梅潮鎮守使圍在興寧城內時，危機又是靠「伍羅二紳」解決的。¹⁵⁵ 經過清末民國的權勢轉移，舊日的士紳在不少地區的基層權力機構中仍有重要作用，而有軍事經歷的人往往更容易在權力機構中嶄露頭角。¹⁵⁶ 無論是舊日之「士紳」，還是軍事新貴，他們在地方公共事務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羅師揚本人對能「以地方款，籌地方事」的做法頗為稱道¹⁵⁷，但此時他所認為亟待辦理之「地方事」，卻得不到掌控「地方款」之人的支持。當他在1924年底被推為興寧縣縣長時，羅師揚便直接身處這一尷尬處境了：「改良街市事，因有巨閥阻力，所有幹事，均經辭職，市政暫由本署辦理，然以阻礙太多，無能為力，徒呼負負」。¹⁵⁸ 在任縣長兩年間，羅師揚這一擁有舊日功名，又在新政權中有一定經歷的讀書人，當擁有「官」這一身份時，便不得不面對趁亂而起，掌握軍事力量的「巨閥」，以及「士紳」耆老的阻力。

與之同時，教育無疑是羅師揚生命中另一重要的事業。從清末及至民國，興民學堂／中學、梅州中學、植基學校等多所學校都有著他的足跡。而無論是民初以美國情況作比的「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以及「今者萬國交通，百業競進，以商戰，以兵戰，為學戰」的說法，還是20年代初因興寧「偏重文學」，而擔心「近來風氣趨重實科，自北大以迄京外省立各校，科學益高，取錄益刻」的議論，都可以看出羅師揚對教育的重視，以及新形勢對他的影響。¹⁵⁹

誌》的主編。

- 154 相關討論參考1922年7月的《寧江週報》。筆者所能看到的《寧江週報》只有1922年7月的幾期。
- 155 參考黃其藻編輯，羅師揚校訂，《興寧鄉土歷史》相關記載。
- 156 邱捷，〈民國初年廣東鄉村的基層權力結構〉，《史學月刊》，2003年，第5期，頁89-96。
- 157 羅師揚，〈陳鴻初追悼會演說詞〉，《山廬文抄》，卷1，頁24，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 158 羅師揚，〈署中示香林男〉，《山廬文抄》，卷5，頁17，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 159 上述三段議論分別引自羅師揚，〈興民中學民五國慶行禮訓詞〉，《山廬文抄》，卷1，頁17；〈鎮南道小學教員講習所同學錄序〉，《山廬文抄》，卷2，頁9；〈興民師範同學錄敘〉，《山廬文抄》，卷2，頁15，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但在另一方面，羅師揚的一些觀念卻並不十分「趨新」。1920年代初，他曾與其他讀書人聯名向縣署「呈請褒揚節婦黃丘氏」，因為該女守節三十五年，奉養姑嫂，撫育兒女。¹⁶⁰ 黃丘氏的做法與歷代方志中「烈女」的事蹟大同小異，對她們的旌獎在民初也延續了下來。袁世凱政府頒布《褒揚條例》，規定「婦女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應予以褒揚¹⁶¹，孫中山的政權亦有相應的褒揚令。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女子貞操問題則受到了新文化學人的批判。¹⁶² 有學者認為，隨着數量的增加，節婦在清末已不再是「地方社區」驕傲的象徵，但下層則對精英的模仿往往慢人一步。¹⁶³ 有着舊學背景的羅師揚，對節婦的看法似乎仍舊延續了清末「下層」讀書人的觀念。1924年由羅校訂出版的《興寧鄉土歷史》中言及興寧「婦女之特性」時，也認為興寧婦女「以貞節為榮」。¹⁶⁴ 甚至到1927年編撰族譜的時候，羅師揚還把「節婦表」編入其中，言「婚姻自由，家庭改革，男女解放，社交公開，此等可認為是一種時髦之學說，而不可仿行於系統莊嚴之家族，破壞數千年相承之禮教」。青年婦女守節，「概精神所至，足以格金石而迄鬼神」，足見其守衛

160 〈呈請褒揚節婦黃丘氏〉，《寧江週報》，1922年7月6日。

161 《褒揚婦女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條例》頒於1914年，《修正褒揚條例》規定婦女受褒揚者為：節妻，年在30歲以內，守節50歲以上，或年未50歲而身亡（以守滿十年為限），或女子未嫁而自願為亡故未婚夫守節者；烈女烈婦，凡遇強暴不從而死或羞忿自盡及夫亡殉節者。參考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5卷1號，1918年7月14日。

162 參考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5卷1號，1918年7月14日；以及〈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7卷1號，1919年12月1日。

163 關於清代節婦的研究，參考Susan Mann, "Widows in the Kinship, Clas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s of Q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1(1987): 37-56。此外，與羅師揚態度相似的一位從舊式教育過渡到新式教育的粵西文人雷澤普，也在文集摘錄了一篇仿班昭所作的《女誡》，並深表認同。該文列出貞淑、三從四德、戒夫婦平權等七條戒律，措辭更為嚴厲。參考雷澤普編，《松下述學集》（廣州：廣東編譯公司，民國十二年〔1923〕）。雷澤普（1878—？），新寧人，光緒時曾受學於多位著名塾師，後又兼應廣州越華、粵秀、羊城三大書院月課。年屆27歲時，科舉已廢，於是再入讀新式的廣東高等學堂，爾後回鄉主持學務，組織團練，1919年又獲選為省議會議員，曾在清末編《新寧鄉土歷史》與《新寧鄉土地理》教材。

164 黃其藻編輯，羅師揚校訂，《興寧鄉土歷史》之「編輯大意」。這個議題曾於1920、1922年兩次在興寧縣教育會上提出，但均告流產。參考王思贊，〈促成興寧鄉土歷史、地理案與教育會長張玠、黃廷言〉、〈分致鄉土地理歷史編撰員羅幼山黃魯芬袁孝宜先生函〉，《興寧縣教育會期刊》，第1號（1924年5月），頁129-130。

舊道德的態度。¹⁶⁵

上述《興寧鄉土歷史》的編撰也頗能看出羅師揚的眼界。該書是為初級小學課本，目的乃是引起「兒童歷史之觀念」。選材含《廣東通志》、歷代縣志，與「鄉先達各家筆記所載，並數十年耳目所聞見者」¹⁶⁶，選材和體例都與清末廣東廣為編撰的鄉土歷史教科書多有相似之處。鄉土教育為清廷新學制下在小學堂推行「國民」教育的手段之一，「鄉土」與「國家」兩個命題在教科書中被有意的聯繫起來。¹⁶⁷在不同的語境下，「國家」、「國民」與「鄉民」等概念在此書中已少有強調，然清末的影響卻及至民國。雖然國民政府無鄉土教育的規定，但不少清末出版的鄉土教科書在民國也一再重版刊行。促成興寧編撰鄉土教材的一個動因，便是「吾寧創辦學校已歷廿餘年，以新學詔起後實較各邑為最早，而鄉土歷史地理各邑編撰者已佔多數」，「此書反瞠乎他邑之後，不可謂非先知先覺之責也。」¹⁶⁸鄉土教材的編撰在此時與新式學堂共同成爲了「開風氣之先」的象徵，這本書也最終應用到興寧的小學教育中。

面對一些流行的新作品與新思想，羅師揚的態度亦頗爲曖昧。比如他在1920年出席省教育會議時看到了胡適的《嘗試集》與《中國哲學史大綱》，便言「如今這位胡先生了不起，不特於舊學很有研究，而且讀了我們很多沒有讀過的古書。他有許多見解是前人沒有發表而我看起來是十分對的」，但他對待白話文的態度卻頗爲謹慎，「白話體詩是他個人的獨創，我以前沒有見過，遂不敢說他好壞」。¹⁶⁹至少就其存世的文字看來，羅師揚終其一生也沒有用白話文進行過寫作。而在他的文言文著作中，最後一本便是他主撰的族譜。

八、家族歷史的寫作——族譜的編撰

羅師揚在1924到1926年間任興寧縣長，1926年4月辭職後，他與族侄羅

165 羅師揚等，《興寧東門羅氏族譜》，〈節婦表〉。

166 參考黃其藻編輯，羅師揚校訂，《興寧鄉土歷史》之「編輯大意」。

167 參考程美寶，〈由愛鄉而愛國：清末廣東鄉土教材的國家話語〉，《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68-84。

168 王思贊，〈促成興寧鄉土歷史、地理案〉，《興寧縣教育會期刊》，第1號（1924年5月），頁126-127。

169 參考羅志甫，〈紀念幼珊先生〉，載羅則桓編，《羅幼珊先生挽言錄》，頁58。

雅達議修羅家族譜。次年10月，成《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共25冊，包括宗支、祠宇、墳塋、家傳、選舉、禮俗、教育、職業、藝文與雜錄十卷。由於現今能參閱的族譜有所殘缺，下述討論僅依照現有的材料進行。¹⁷⁰

根據羅師揚的序言，在此之前，羅家只在明崇禎九年（1636）一度修譜，後並無更輯新譜，因而他「嘗引以為憾，特以為國馳騁，未遑及此。邇者，倦而歸里，將息頻年，適綺文侄亦遊宦歸來，鄉居無事，辰夕晤對，均以舊譜殘缺為言，彼此倡議，更輯新譜，二人分任編纂。」¹⁷¹ 羅師揚這位讀書人將他生命中的大部份時間歸為「為國馳騁」，終於在退休之年，能夠從「國」事回到「家」事，騰出時間完成這一久欲進行的工作。在這段修譜的時間裡，羅師揚大部份時間呆在譜局，「謝絕親朋應酬，日夜惟執筆修譜」¹⁷²，將大量的心力放在了譜牒的纂修之上。

譜成後，記載世系的「宗支」一卷最為卷帙浩繁。在此卷對族源的追溯中，羅師揚等人重構了崇禎九年（1636）至民國的一段宗族歷史，還借鑑其他羅族族譜的敘述，把興寧東門羅族的歷史接上，以將其歷史追溯得更為久遠。「例言」中提到，「始祖至五世，舊譜未載生終，今據江西大成譜增入，藉備參考」。¹⁷³ 而羅氏以豫章為郡望以及後世子孫的遷移繁衍，都是「謹按大成譜」。這樣，「宗支譜」就將始遷祖前的歷史補充完整。關於族源，族譜云始遷祖「循州公」原籍福建寧化石壁村，於南宋末年遷至興寧，類似的追述可見於客語地區大量族譜的遷移史描述。¹⁷⁴ 而祭祀始遷祖循州公的雪洞祠堂，由十世希哲公建於明萬曆年間，祭大遷祖祝融公的梅縣羅氏大

170 筆者在廣州所見的寧東羅譜只有六卷，其中〈宗支譜〉只有第一冊，〈藝文譜〉也不齊，並且缺了「雜錄」，其他的尚算完整。

171 參考羅師揚等，《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序言〉。

172 羅則桓編，《羅幼珊先生挽言錄》，頁17。

173 參考羅師揚等，《興寧東門羅氏族譜》，〈例言〉。此「江西大成譜」成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其「卷一」提到漢代「景帝間，吳連七國反……其後羅氏為豫章郡望，派衍繁盛，星羅棋佈，晉宋齊梁之際，散居天下，難以會歸，惟柏林衍慶，有會歸焉」。關於江西大成譜，筆者僅能得見其卷一。參考羅香林編，《客家史料彙編》（臺北：臺灣天南書局有限公司，1992），頁150-151。

174 參考《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宗支譜〉。關於族譜中宗族歷史的建構，參考劉志偉，〈附會、傳說與歷史真實——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族歷史的敘事結構及意義〉，載《中國譜牒研究——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149-162。

宗祠則建於清嘉慶年間，列在「第六級」的寧東的始遷祖也在此時拓展了族源與家世。¹⁷⁵ 關於羅氏的發展，崇禎以後，因修祠修譜、科名官宦或經商起家的不乏其人，但更多的是亂世時興團練起家、獲授官銜，當中也包括不少羅師揚的同輩人。¹⁷⁶ 不過，羅師揚一系並不顯赫，甚至可謂清貧，但其父十九世榮輝公也被他列入「家傳譜」，他也把自己置於世系的第二十世中。

編撰族譜的體例與選材，亦可見羅師揚等人的取向。可以看出，這本羅氏族譜多據明清修譜慣例¹⁷⁷，「選舉譜」內容與一般的「恩榮錄」相類，但其後收有「職官」、「職銜」與「職務」三類，便又回應了廢除科舉後的情況，並將民國以來的新形勢包括在內。¹⁷⁸ 羅師揚在序中給自己的做法找了理由：

入民國來，百度維新，前代之高第巍科，尚且見輕於當世，矧庠序諸生等諸自檜以下乎？然而功名以難得而重，學問以爭勝而深，先世以有過人之學問，成茲難致之功名，故當世相健羨，以稽古之榮，固非由於僥致也。¹⁷⁹

至於禮俗、教育、職業三譜的撰寫，明顯是有所創新。後兩者在接受羅香林的建議¹⁸⁰，羅師揚也無直接參與撰修，但前者算是他一人獨力完成。和「選舉譜」相類，羅師揚在編「禮俗譜」時也要面對新時代移風易俗的觀

175 參考羅師揚等，《興寧東門羅氏族譜》，〈祠宇譜〉。

176 參考羅師揚等，《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家傳譜〉。

177 明清時一部較完整的家譜，通常由譜名、譜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傳記、祠堂、墳塋、家規家訓、恩榮錄、像贊、藝文、纂修人名、領譜字號等部份組成。

178 比如，在「職務」中，羅師揚自己便是「歷充植基兩等小學校校長，興寧縣立中學監督，兩廣方言學堂教授，臨時省議會代議士，財政股長，調查東三省實業委員，廣東陸軍司兼稽勛局文牘員，瓊崖鎮守使署秘書，廣西鎮南道小學教員講習所所長，漳州總司令秘書，興民中學校長，私立綻寧國民學校校長」。「職官」則包括「民國二年代理臨高縣縣長，署理澄遷縣縣長兼檢察，七年署福建連城縣知事，十三年署興寧縣知事。」參考羅師揚，《興寧東門羅氏族譜》，〈選舉譜〉。

179 參考羅師揚，《興寧東門羅氏族譜》，〈選舉譜〉，序。

180 羅師揚，〈檢瓊海公餘讀書錄示香林男〉，《山廬文抄》，卷5，頁27，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念。「禮俗譜」中分祭祀、婚娶、喪葬、服飾、飲食、居室、歲時與習尚幾部份。其譜序言：

今必謂其祭祀婚娶喪葬皆古代所遺，飲食衣服居處與衛生不合，非悉捨其舊而惟其新是謀，必不適於現世。此其言當理與否，姑置勿辯，即當矣，而其勢亦必有所格而不行。夫移俗易風，首在揆情度理。與其欲速則不達，為社會仇，何如引勢利導（原文作「引」，或為「因」字音訛），為社會師之為愈也。¹⁸¹

在新語境下，歸老在家的羅師揚重新寫作了家族的歷史。羅師揚提到，自明末修譜建祠，寧東羅家到民國才有機會重修族譜。在他以前，羅家並無自己的家族書塾，人數在興寧亦非最多。通過羅師揚等人的努力，羅家不但有了「開風氣之先」的家族學堂，相較其他大族所撰的族譜，該譜「鉛印成書，所費甚巨」，規模也很大。¹⁸² 其中「宗支譜」就足有厚厚的12冊，可見寧東羅家的世系在修譜時得到廣泛拓展，作為總纂的羅師揚便將自己置於此宏大世系中。修於民初的族譜，往往以遵循舊例為主¹⁸³，而因應1920年代以來的新情況，族譜也新增了一些卷目，並對舊日的內容作出了重新詮釋。

晚年的羅師揚，揪心命理，闢一書房，埋頭整理古籍。¹⁸⁴ 羅師揚還頗為留心局勢與舊日的政見，當1927年冬中國共產黨已佔據「梅花十八洞」後，62歲的他還向門人出示〈屯田策〉，言「果昔年余（策）行者，奸民未得遽如是也。」¹⁸⁵ 直到1931年臨終前，當羅師揚聽到門人羅梓材提到的東北墾殖實邊情況，並言朝鮮已「奄奄無生氣」時，他便「猶感奮，旋太息曰：強迫人甚，今晚恐不保」。¹⁸⁶

1931年6月，羅師揚病重辭世，享年66歲。

181 參考羅師揚，《興寧東門羅氏族譜》，〈禮俗譜〉。

182 羅桂祥，〈興寧宗族（姓）勢力初探〉，《興寧文史》，第6輯（興寧：廣東省興寧縣文史委員會，1986），頁142-153。

183 由羅獻修監修，修於1913年的《興寧高車羅氏族譜》的譜例就與舊例相去不遠。

184 關於晚年羅師揚的活動，他的門生多有討論。參考羅軌青，〈人生妙詩〉；曾萬里，〈一段因緣〉；陳子明，〈追悼羅幼珊先生〉；羅志甫，〈紀念幼珊先生〉等，載羅則桓編，《羅幼珊先生挽言錄》，頁49-58。

185 參考羅梓材，《山廬文抄》，〈序〉，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86 參考羅梓材，《山廬文抄》，〈序〉，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九、餘論

羅師揚辭世後，興寧政界與文化界的許多人發起了追悼會，還有門生整理成挽言錄，爲他編寫「年系」，收入誄詞、挽聯、感言等等。1936年，其兒子羅香林收集整理的《希山叢著》出版。當時的羅香林任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館長兼任中山大學副教授，其奠基性著作《客家研究導論》已出版，又曾任中山大學校長室秘書兼廣東通志館纂修，與鄒魯、朱希祖等人交往甚善，在學術界與文化界具有一定地位。《希山叢著》的詩抄、文抄，乃至亞洲史等卷，都找到了不少名流爲其作序，一些是羅師揚的門生，一些則甚至不認識羅師揚，僅是因爲羅香林的面子。而羅香林的政治立場，還在更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爲其父撰寫的年譜。30年代的羅香林已是一個典型的「黨化」學者，年譜中有大量把其父「民主革命」思想追溯到清末的言論，也有不少強調父親與黨國元老早就有交往的措辭，甚至對羅師揚在政壇中的不少做法都有誇大乃至美化的嫌疑。¹⁸⁷ 身處民初的政治與社會變遷，羅香林這種做法也折射了其時政治與學術糾結不清的關係。

而關於羅師揚的身份，後世的我們又應如何思考？如果說，羅師揚清末的功名能夠讓他足夠成爲一名「士紳」，那爲何在民國時抱怨地方施政困難之時，他自己筆下亦會提到「士紳」的阻撓？如果說，他在廣東政壇的從政經歷能讓他進入「官」這一行列，又爲何他會屢屢被人以「文人」目之？從存世的材料看，無論在朝在野，他都對「國家」形勢頗爲關注，這種關注是否又是一種舊日士人「家國天下」關注的延續？而他一生寫下的大量舊體詩，與友人詩咏酬唱，是否又能讓我們觸及一種自古以來的文人情懷？¹⁸⁸ 一

187 比如說，羅香林在年譜中提到，羅師揚在甲午後寫〈人有不爲而後有可爲說〉等文是因爲「目擊時艱」後「以革命思想灌注青年」，言其「震於內憂外患之切，革命思想益不可竭」。1905年的年譜也言羅師揚閱《民報》後，鼓勵學生勤習西學，預蓄革命實力，類似的說法在年譜中多處可見。此外，在注重年齡輩分的時代，比羅師揚年輕11歲的何曉柳也不大可能是他的幼年同門，羅香林將何描述成其父的同門，很可能是爲了追溯其父與國民黨元老早有交情。羅師揚與鄧仲元的關係也類似，年譜中將兩人描述成清末就相識的朋友關係，但羅師揚在多大程度上會與比自己年輕19歲的鄧仲元交上朋友，還是很值得懷疑的。在龍濟光入粵後，大量的人被劃爲亂黨，羅師揚能安然回鄉教書，也說明了當時的他與革命黨關係不甚深，其在政壇的地位與角色很可能被羅香林誇大了。

188 羅師揚存世的著作中，有整一卷的《山廬詩抄》，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王越對其詩有「感懷時世」的評論，見該卷詩集王越所作序。

般認為，科舉制廢除後，「士」這一階層便宣告逐步瓦解，但民國時仍有門生因羅師揚的「士大夫」氣節而對他十分敬重。晚年的羅師揚會和門生聊古人詩文，聊身世和興寧掌故，還會聊風水、卦箋、命理、相法，會聊遊廬山的美景，會搖頭背誦自己作的詩歌，還會背誦舊日的八股文。也就是這樣的生活趣味，他的門生認為這是「古代中國式士大夫的情操」。¹⁸⁹ 筆者無法得知這種說法是否也得到羅師揚的認可，但我們至少可以通過羅師揚的個案了解到，面對清季民初的社會變遷、權勢轉移，這些稱謂、身份乃至認同，其意涵是多麼的複雜多變。從僅有的材料入手，文章離貼近羅師揚的心境還相距甚遠，但從科考經營、新學堂的興辦與新教科書的編撰，到新政權中的沉浮，他一生的行為與零星的議論所及，卻如此清晰地讓筆者感受到歷史洪流中一個個體的思考與嘗試。其實，無論是「士紳」還是「讀書人」，都是研究者的標籤，本文題目使用含義更為寬泛的「讀書人」一說，也是為了討論的方便。和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羅師揚身上既存在一個群體的共性，也有着其作為個體的特性。

可惜，筆者並未能搜集足夠關於興寧的材料，民國時僅有的一些報刊也多出自官方記錄。作為一篇探討地方讀書人的文章，對「地方」關注不夠是本文最大的不足之一，只能從中看出些許端倪。一方面，從方志描述的興寧風俗，到羅師揚自己筆下的風俗，再到門生對羅師揚的追溯，在這種「地方」與個人的互動中，或可見一種生活經驗的歷時性。同時，羅師揚也意識到「道咸以來，歐風東漸，濱海諸縣受創獨深」，但「吾寧居省會極東，固鄙邑也」¹⁹⁰，近代的社會變遷對興寧的影響可謂相對滯後，但信息傳遞與交通的日漸發達還是給羅師揚帶來了許多變化。從興寧到粵東、省城，加之海外的聯繫和從政的經歷，羅師揚的活動範圍與眼界都在不斷擴大。他的宦途不可避免的受到粵省革命黨的影響，而離穗歸邑後，他的目光又回到興寧，在教育、政治、公益活動中處處可見他的身影。和當地的讀書人一樣，他關注「吾寧」在「各邑」中的位置，也將興寧置於「嶺東」之中進行考量。¹⁹¹

189 陳子明，〈追悼羅幼珊先生〉，載羅則桓編，《羅幼珊先生挽言錄》，頁55。

190 羅師揚，〈慰堂何先生暨德配陳太君六旬榮慶壽〉，《山廬文抄》，卷2，頁13，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91 如他在〈寧江週報創刊詞〉中就提到「吾邑富庶，聞於嶺東，中區之繁盛，更爲他鄉所不及」。而上文也提及，在討論編撰鄉土教科書的必要性時，興寧的讀書人也着力與將「吾寧」與「各邑」進行比較。

他還擔心在「人稠地窄，貧戶多，素封少」的興寧，很少本地的年輕人能夠從「吾邑」的中小學、到「穗垣」的「高等各校」，最後進入「京都」的「大學」，爬完這一新教育制度下的階梯。¹⁹² 另一方面，羅師揚在民初政壇的活動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作近代「客家人」爬上社會階梯，謀求地位過程中的一部份。¹⁹³ 包括影響羅師揚際遇的陳炯明、鄧仲元在內的不少國民黨重要人物都是廣東說客語之人，羅香林甚至考證出孫中山也是「客家人」。¹⁹⁴ 國民黨在南方發蹟初期，方言與宗親集團作用明顯，而「客家人」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也部份地影響了日後民國開展的「客家」研究工作。

不過，羅師揚與「客家」的關係也許更為微妙，因為他還是客家研究鼻祖羅香林的父親。而羅香林的長輩，羅師揚敬重的胡曦、恩師羅獻修、同輩羅藹其都曾在其著述中詳細討論過「客家」的問題。¹⁹⁵ 然而，面對羅師揚這樣一位著述豐富的讀書人，筆者卻沒有發現他有專門討論「客家」的著作。在其參與校訂的《興寧鄉土歷史》「民族由來」一章中，羅師揚討論了所謂「客族」的由來，但其總纂的《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卻無甚「客家」的痕跡。不過，其對族源的敘述和其他許多所謂「客家」地區的族譜一樣，成爲了後來羅香林論證「客家」中原南遷，血統正宗的證據。而從未提及「客家」的「禮俗譜」，記載的就是後世研究者頗爲着力乃至引用的「客家」風俗。羅香林爲其父編撰年譜的時候，曾言其父用「客家方言」撰寫劇本，和

192 羅師揚在〈興民中學校同學錄敘言〉中提到，「吾邑人稠地窄，貧戶多，素封少。莘莘學子，中學畢業以後，能赴穗垣入高等各校者，十人中僅得二三，能北首燕路，入京都大學者，十數人中僅得一二，其餘皆迫於清貧，無力更事遊學也」，《山廬文抄》，卷2，頁11，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93 梁肇庭曾提到，19和20世紀「客家」的意識可以在兩個更爲廣泛的階段中考察：19世紀「客家」人以族群遷徙作爲手段，降低危險以求生存的做法；20世紀對新政治環境所展示出來的機會作出的回應。這也是兩種爲求生存或提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策略。面對20世紀初的社會變局帶來的新機會，包括軍事中的職位，新式教育的傳入以及隨之而來的職業，與將大門敞向有能之人的新政治結構，「客家」人成功的獲得了政治與軍事上的影響。參考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27-31的相關討論。

194 參考邱捷，〈再談關於孫中山的祖籍問題——兼答〈孫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頁60-69。

195 胡曦曾考證「客族源流」，羅獻修在清末編的《興寧鄉土志》的「人類」一節中，也討論了興寧的「客家人」，羅藹其則是在1920年代寫成《客方言》，被認爲是當時最爲條理系統的研究客家方言的著作。

羅藹其討論過「客家方言」，但這始終是出自羅香林之口。而且，從胡曦等人筆下的「客」或「客族」到羅香林研究的「客家」，其意涵已經有了一定的變化。咸同年間土客械鬥等人群接觸與近世粵、潮、客的人群互動刺激了「客」自我區分的意識，西方種族觀念的傳入又導致了「客族」這類詞彙的產生。到了羅香林的年代，民俗學和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為他提供了一套學術的語言，經由他的大力鼓吹，客家成為了優秀血統的代表。

筆者更願意相信，作為羅香林的上輩人，羅師揚對自己「客家」的身份並無過多的關注。身處此潮流中，他會認同包括自己在內的邑民是「客族」或「客家人」，但這種對「客家」的認識，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方言和習俗層面，而他對所謂「客家方言」的討論，或許也僅是出於對興寧本邑方言的興趣。畢竟和興寧方言類似性質的習俗和風物，他自小就多有關注。1910年，39歲的羅師揚在〈寧昌風物記〉提及「邑俗諸子析居」風俗時，就談到「丈夫婦人老而無子依侄以終者，間亦有之，若贅婿，則鄉里所鄙賤，粵中惟潮州各屬有之，吾邑向無此習」。¹⁹⁶ 此類通過地域區分風俗的習慣，延續了編撰地方志文人的慣常做法，也自然沒有彰顯出所謂的「客家」認同。

羅師揚去世後不久，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出版，對後世影響深遠。時至今日，許多興寧人自我界定的時候，仍首先想起「客家人」，仍對羅香林引以為豪。在《客家研究導論》的自序中，羅香林提到「我研究客家問題，最先頗受先父及先兄玉林的影響」。¹⁹⁷ 通過翻閱羅師揚的文章，筆者不禁產生疑問：父輩的影響對羅香林成體系的客家學說究竟到達何種程度？會否僅是討論一縣風物的影響？也許僅僅是父子之隔，兩人的關注就發生了從「吾邑」到「客家」這一側重點與意義的變化，其過程或許值得今日客家研究者深思。

（責任編輯：陳景熙）

196 羅師揚，〈寧昌風物記〉，《山廬文抄》，卷1，頁39，收入羅香林編，《希山叢著》。

197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自序〉，頁3。

The Life Course of Local Literati in Eastern Guangdong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The Case of Luo Shiyang (1866–1931)

Minling L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many literati, holders of lower degrees, remained in their native places for most of their lives, working as teachers or as functionaries in local government. They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many local affairs and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local society. They were also personal witness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t the turn of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is paper uses the life of one individual, Luo Shiyang from eastern Guangdong, as a case study for understanding the wider social transformation. It also looks at how the ideas and behavior of local literati might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time.

Keyword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local literati, Luo Shiyang, eastern Guangdong, Xingning County

Minling L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No.5 Yih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871. E-mail: money-emf@163.com.